

彭真與劉少奇政治關係之研究(1928-1966)*

鍾延麟**

關於中共早期的重要領導人彭真和劉少奇之間的政治關係問題，西方學界有一個相當普遍流行的觀點——劉少奇、彭真上下之間長期保持庇護、扈從的派系關係，休戚與共、互為照應，並且在政治上多與毛澤東對立和抗衡。本文經過細密的爬梳和分析後，認為相關說法與歷史實際情況有嚴重的出入。彭真、劉少奇結識早、也數次共事，但是他們對毛澤東的政治信從和效忠，隨著後者最高領袖地位的確立而深植在心。經營與毛澤東的關係、維持其對自身的信任和好感，也皆成為彭真、劉少奇各自的首要之務。在此背景下，彭真、劉少奇之間如何看待和定位對方，雖不無受到雙方直接互動經驗的影響，但最主要還是基於彼此與毛澤東的關係親疏和變化。從194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前半葉，彭真視劉少奇為毛澤東的政治副手和繼承人而多予敬重和配合；劉少奇見彭真屢受毛澤東器重，也對之加以信任和重視。在1962年經濟調整問題和1964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上，劉少奇與毛澤東出

* 作者特別感謝陳永發教授、李海文研究員，以及其他不便具名的中國大陸研究人員，曾對本文惠予指導與支持。本文如有任何問題，概由作者自負。作者並感謝三位審查人所提供的重要建議和意見，以及行政院科技部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4-2410-H-004-085)。

**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聯絡地址：11605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No.64, Sec. 2, Zhinan Rd., Wenshan Dist., Taipei City 11605, Taiwan [R.O.C.])。

現政策意見分歧；相對之下，彭真卻與毛澤東看法相近。毛澤東因社教問題怒叱劉少奇之後，彭真對後者不假辭色地指正；爾後局勢急轉，彭真反而先遭毛澤東離棄，劉少奇也迅速投入批鬥彭真。從「文革」中毛澤東處置劉少奇、彭真問題的差異，以及彭真晚年相關的政治自白，也反映了彭、劉在「文革」前並非形影不離，而是有所距離。本文對彭劉關係複雜面貌的重建和其驅動主因的探究，連帶所及，也對早期中共高層政治以派系立論的描述和解釋，提出有力的挑戰。

關鍵字：彭真、劉少奇、毛澤東、中共政治、中共黨史

一、前言

彭真(1902-1997)是中共政治和歷史中的一名重要政治人物，長期參加最高決策並司掌多項要職和工作。關於彭真在中共黨內的人事關係問題，海外相關研究經常提起的是：他與「文革」前長期作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劉少奇(1898-1969)之間的政治關係。

在西方論者的眼中，彭真的顯赫地位和權力，主要源自和依託在劉少奇的庇護，政治命運也隨之而浮沉。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將彭真描寫成劉少奇的政治人馬：兩人早年在華北共事，奠定牢不可破的派系關係和同志情誼。中共入主中原後，彭真作為劉少奇最重要的親信和助手。在政策主張上，彭真以劉少奇的態度為是非。例如：針對毛澤東發起的整風運動，劉少奇有所保留，彭真也因此消極以對、甚至暗中抵制；對於毛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劉少奇、彭真一開始雖也響應，但看到問題浮現後，即以恢復穩定和秩序為號召；在檢討「大躍進」得失之時，劉少奇對毛的看法出言不遜，彭真更直接向毛發難、直言毛有責任。在毛覺得劉少奇與自己漸行漸遠，必須要予以剷除之時，為了翦除劉的羽翼，就先設計構陷彭真，以斷之左臂右膀。劉在彭真不保之後，失去了外層保護，不久也黯然下臺。¹

黃靖(Jing Huang)在其研究中共政治「山頭」發展的專著中，談及彭真和劉少奇的關係時，基本上就按照馬若德的思路。²無獨有偶地，皮特曼·波特(Pitman B. Potter)撰寫的彭真政治傳記，同樣秉持著彭真以劉少奇為首是

¹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45-146.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75, 178-179.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443-445, 456.

² 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6, 129, 150, 274-275.

瞻、也與後者榮損與共的論點。³羅德明(Lowell Dittmer)所寫的劉少奇傳記，在處理其傳主和彭真的關係時，也大抵如此，沒有跳脫這個思維框架。⁴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一向不遺餘力地駁斥那種主張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政治對立、政策殊異，各自旗下的人馬也不時敵對較勁的「兩條路線鬥爭」(Two-Line Struggle)觀點。但是當泰氏處理到劉少奇和彭真的政治關係問題時，也認為他倆淵源甚久，保持尊卑有序的派系關係特質，而無對之作一個縝密的梳理和剖析。⁵

相對於西方學者慣以「派系政治」劃界、簡單化約看待彭真、劉少奇的政治關係的觀察和做法，中國大陸的官方研究人員則有意地不去特別處理、討論他們兩人的關係。在中共官方編寫的《彭真傳》和《劉少奇傳》中，都無專門敘及此一問題。這與中共官方史家在研究、書寫其「領袖人物」時，向來不會議論傳主的政治人際往來的習慣有關。如此或許也可以避免觸及當事人之間的一些涉及敏感的政治殊異問題。換言之，中方學者對西方所持的劉少奇、彭真兩人沆瀣一氣、結黨行事的流行說法，可能感到不值一駁、不足與議；但也不想對此深談，以免動搖、損及此二位政治要員之間一心向公、彼此相惜並和諧配合的正面形象。

本文欲處理的問題有：彭真和劉少奇之間時間跨度超過半甲子的往來實況和關係性質究竟為何？在「同一宗派」的刻板概括和「焦孟不離」的簡化論述之外，其實際上存在什麼樣的複雜面貌？驅動或制約這組雙邊政治關係發展的主要因素又是什麼呢？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在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政治體制和運作中，毛享有的崇高威信、整風反宗派的嚴明規範，以及激烈的黨內鬥爭經驗(高崗敗亡的殷鑑不遠)，使得劉少奇、彭真之間縱使工作關係悠久和密切，不可能、也不敢暗中政治結盟或協作對抗毛澤東。相反地，彭真、劉少奇各自都最

³ 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86, 89, 104.

⁴ Lowell Dittmer,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8), revised edition, 32, 275.

⁵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second edition, 503-504.

優先重視自身與毛澤東之間單線的政治關係和信任，並遵照毛澤東的態度來決定如何看待對方。彭真方面，彭真尊重、甚至逢迎劉少奇，除了是長年上下級的緣故，更重要的是，彭真見毛澤東長期以來對待劉少奇如其接班人；1960年代中毛澤東嚴厲批評劉少奇後，彭真對後者的態度即有所變化。劉少奇方面，劉少奇對彭真重視、重用，甚至如其所言當作是領導人培養，除了有過共事經驗，對之能力了解；更關鍵的原因是，眼見毛澤東對彭真的欣賞和器重；但當毛澤東決定打倒彭真，劉少奇也未有遲疑地加入對彭真的批鬥。彭真、劉少奇之間的政治關係演變，反映出在毛澤東為中心的強人政治下，政治要人傾心籌畫、傾力推進黨國事業的同時，各謀事主爭榮、各求生存發展的基本特性和關係模式，彼此相識甚早、工作緊密交纏的彭真、劉少奇也不例外。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細膩檢視彭真與劉少奇之間的工作關係和政治互動，並且對認識中共早期的高層菁英關係、人際往來問題，以至政治史有所裨益。本文使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年譜傳記、回憶資料、檔案文獻、「文革」批判資料、訪談資料，⁶以及相關的研究著作。本文的章節安排，在前言之後，依時序細密爬梳彭真和劉少奇在各階段的共事相處情形，包括：1928年的順直省委員會、中日戰爭前夕和開戰初期的北方局、抗戰後期的延安、國共內戰的中央工作委員會、中共建政初年的「高饒事件」、1956年中共「八大」和之後的社會主義實驗和建設(整風運動和「大躍進」、經濟調整時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文革」爆發的前夜和其後。在結論的部份，先簡要說明本文研究對既有流行觀點的質疑批判，最後介紹彭真晚年如何看待有關的歷史和人事問題。

⁶ 本文利用作者在中國大陸所做的訪談所得，以作為重要的補充。為了不造成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乃以甲、乙、丙代號名之，另外加上訪談的地點和時間。

二、順直省委初識(1928)

彭真和劉少奇之間政治關係的建立和初期互動，主要在 1928 年所謂的「順直省委糾紛」期間。1927 年 4 月 12 日，在南方領導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蔣中正，在上海發動「清共」。以張作霖為首的東北「奉系」，不久也在天津、北京逮捕、處死多名中共領導幹部(包括其創黨人李大釗)。面對北方組織的重挫，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順直省委員會(簡稱「順直省委」)，以統一領導黨在華北地區的工作。

1927 年 6 月，順直省委在天津成立。經其安排，彭真(本名為傅懋恭，當時用名為傅茂公)初始參與領導天津和唐山的工作，之後才參加省委的工作。由於順直省委組織變動大和人員流動多，再加上彭真在指導地方工作時表現出來的工作能力，1928 年初彭真就曾短暫代理順直省委書記，獲選省委常委、出任組織部長和兼管天津當地工作，其後也實際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

因為時值國共關係丕變，中共中央急於應變和摸索，順直省委也相應地存在方向不明、政策搖擺的問題。其次，順直省委管轄範圍寬廣，但其領導成員卻有素質低下難以適任、甚至革命意志不堅定的問題，面對的又是思想紊亂的下層幹部和黨員。省委在領導和推行政策時，因而經常「顧此失彼，苦於應付，難以正常發揮領導職能」。遭逢此一困頓局面，1928 年春，彭真請求過路天津、計劃前赴東北的劉少奇予以幫助。這是目前所能看到彭真和劉少奇之間最早接觸的紀錄。

劉少奇在停留的數日之內，找人談話、了解情況，分析情勢、宣講政策，也批評認識有偏差的人員，使之「在不同程度上消除了對省委的誤解與隔閡」。劉少奇離去前也表示將向黨中央反映順直省委的問題。⁷劉少奇將有關情況上報後，同年 5 月中旬，中共中央決定劉少奇參加順直省委常委會，以加強其領導力量。6 月初，彭真即曾向具有中央來人身份的劉少奇，報告順直省委內部紛爭的情況。⁸這應該是彭真、劉少奇兩人之間具有

⁷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112-113、119。

⁸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卷，頁44。

正式組織關係的開端。

為因應國民革命軍進佔平津的情勢發展，6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由陳潭秋、劉少奇、韓連會組成(代號「潭少連」)。7月下旬，在此三名中央特派員的主導下，順直省委召開大會、重新改組(韓連會擔任書記)。從彭真是新選的省委常委之一並續任組織部長，可反映劉少奇對彭真持有一定的信任和欣賞，但是為時不久就出現了變動。

甫改組的順直省委，在入秋後即遭到部分地方黨委的質疑和抗議。10月，唐山、玉田、遵化、樂亭四縣黨組織組成「京東護黨請願團」，上訪天津，批評順直省委在國民黨掌控平津的新情勢下束手無策、對工作指導不力，要求赴上海向中央告狀。彭真作為順直省委的一名領導要員，自難接受請願團的立場，更何況這股京東反省委的浪潮中，不乏針對他個人的不善指控，例如：批之破壞黨的紀律、輕率地自行決定他人黨籍問題，以及耍弄軟硬手段應付工作和同仁。針對來勢洶洶的請願團，彭真態度強硬，主張取消相關地方黨委，亦即撤銷其領導職權。⁹

眼見順直省委陷入領導和信任危機，以及因其工作不彰導致舊怨未解、又添新仇(彭真個人自難脫干係)，劉少奇在內的「潭少連」的處置方案，乃是將爭執的兩造「各打三十大板」——停止順直省委行使職權和停止京東黨部的活動，改由「潭少連」直接行使和管理。劉少奇等人的決定和措施，不但請願團人士如李運昌不滿意，彭真也未見得服氣。因為彭真參與領導的順直省委不復存在，等同他先前堅持的努力和藉以活動的政治平臺都隨之而去，只被安排轉任天津的地方黨職。一甲子以後的1988年，彭真在回憶這段涉及自身早期政治起伏的往事時表示：「劉少奇、陳潭秋以中央

⁹ 〈樂亭縣委關於改造順直黨的意見〉(1928年12月18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種本(出版地不詳：河北省政府印刷廠，1998)第17冊，頁34。〈張兆豐致中央的信——對順直工作的意見〉(1928年10月5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甲種本(出版地不詳：河北省政府印刷廠，1991)第2冊，頁515。〈與李芳啟談話——樂亭縣黨的各項工作情況〉(1928年12月20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2冊，頁583。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104-105。

特派員身份讓省委停止工作，並調我去上海。」¹⁰

劉少奇對順直省委紛爭失之簡單、生硬的解決方案和方式，不久即遭到中共中央和代表出面處理的周恩來的糾正，劉少奇被認為犯有「取消主義」和「命令主義」的錯誤。周恩來在調查後直接推翻劉少奇等人先前的政治決定，恢復省委職權並進行改組。劉少奇被迫撰文檢討，也自認不適而求去。¹¹

至於彭真，因為他深陷先前的順直省委糾紛並成為爭論僵持的一方，最後也沒有被允許回到順直省委領導行列，甚至還差一點兒被調離河北，只因他熟悉基層，被新改組的順直省委留在天津幫忙工作。半年後，彭真遭到當地政府逮捕，之後坐牢長達六年。

三、中日戰爭以前北方局共事(1936-1937)

彭真和劉少奇再次見面和一起工作，則是到了 1936 年。

1935 年 8 月，彭真出獄後，亟思重回共黨。當時領導華北數省工作的北方局，由高文華和柯慶施負責。彭真後來回憶：「當時北方局的書記是高文華，組織是柯慶施，宣傳是李大章，後來我是和他們接上了關係」。¹²柯慶施安排彭真工作時，並未注意其過往主要從事工人運動的經歷，而要之接替李葆華(李大釗之子)前去冀東發展農民運動。

1935 年底，北平發生大規模的學生抗日示威遊行，引起各方矚目，也就是所謂的「一二九運動」。同年 12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舉行瓦窯堡會議，提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決定派遣劉少奇(政治局候補委員)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領導北方局工作，期以在華北遂行相關的政策目標。

1936 年春，劉少奇抵達天津。劉少奇初來乍到，急需人手。他一方面起用行事務實但先前遭受打擊的幹部，例如：李鐵夫和其妻張秀岩；另外，

¹⁰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頁 83-84。

¹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 125-126。

¹²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彭真生平大事年表》，頁 84。

他也注意當地有無自己過去認識的人。經由北方局派置身邊的秘書林楓的介紹，劉少奇聞知彭真剛赴冀東工作的情況。劉少奇表示認識彭真，「大革命」時期曾在一起(這應該指的就是 1928 年順直省委那段不見得全是愉快的互動經歷)，並指示將其調回天津。¹³同年夏末，彭真回北方局工作，出任組織部長。

彭真從牢房出來後，被柯慶施調派從事其不熟悉的農運工作，劉少奇來後不久，他就獲任北方局組織部長，前後僅約一年的時間。彭真受此提攜，對劉少奇多少應有感激之情。但更重要的是，劉少奇、彭真在開展北方局工作的過程中，彼此思路相近、默契配合。根據李葆華的回憶，其與彭真在較早之時就看過劉少奇發表的文章和觀點，咸感認同。彭真到北方局工作後，按劉少奇指示奔走地方聯繫、處理大量的實際事務。¹⁴他們領導的「白區」工作，積極地因應情勢、改弦易張，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即出現不小的轉變和蓬勃的生機。

在如何檢視和評價過去北方的「白區」工作，以及在中日關係緊張升高、救國思潮和民氣急遽高漲的背景下，如何領導相關的地下工作等問題，因為劉少奇撰文檢討政策，甚至連續致信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成為華北黨、以至中央高層所關心、議論的重要事項。1937 年中，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又稱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更為此爆發嚴重的爭論。

劉少奇的主要論點是：與國民黨爆發內戰十年以來，中共的白區工作存在的是「『左』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而且其性質屬於「錯誤的惡劣的傳統」；必須要公開檢討、反對這種錯誤的「傳統」，改而創造、採用新的工作方法。針對劉少奇的看法，支持者寡，反對者眾。劉少奇來之前負責北方局工作的高文華，完全不同意劉少奇的觀點，直批劉的「錯誤」「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更強調要將此問題提交中央處理和解決。除了高文華，持反對意見者還有李一夫、李雪峰、吳德、黎玉。會場上對劉少奇砲聲隆隆，會場外甚至還發起反對連署活動，約有半數的白區工作

¹³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95。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年7月。

¹⁴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頁206。

會議代表簽字。¹⁵

傾向支持劉少奇觀點者不多，目前可知的有李鐵夫、彭真和李運昌。然而，若仔細分析彭真支持劉少奇的態度，其實是有些變化和微妙的。(一)從時序上來說，彭真應算是較早表態響應劉少奇觀點的人。在白區工作會議舉行之前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5月6日，彭真發言表示：在瓦窯堡會議之前，「用不著掩飾」，「我們的白區工作是失敗的」；「過去白區工作的失敗，主要的不是客觀原因，而是主觀的原因」。相反地，他強調在瓦窯堡會議後，因為採取新辦法，「工作就有了轉變」。¹⁶從上可以發現，彭真與劉少奇如出一轍，對過去白區工作大加否定並強調事乃人謀不臧；他對於劉少奇與自己推動下的工作進展頗為肯定。

(二)彭真在5月24日白區工作會議上發言，大體上繼續肯定、支持劉少奇的同時，但在部分問題上較其之前的表態有所差異、甚至倒退。據分析很可能是彭真的發言內容：「關於少奇同志的報告，有個別同志不同意，甚至有根本否定，這是不妥當的。我覺得少奇同志的報告：一、對過去的錯誤揭發了；二、黨與群眾工作、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提出了。」

但是同一講話也表示：「他(劉少奇)的報告，我有些不同意的。」其不同意之處有四點：一、「對於過去成績，發揚不夠」；二、「著重反『左』，沒有顧到反右」；三、「對於客觀形勢的變動，工作方式的不同，以前是對的，現在便不對，應分兩個階段來說」；四、「我不同意說『左』傾冒險是歷史的傳統，而是由於客觀的條件，克服了又產生，而且克服『左』傾盲動是長期的鬥爭。」¹⁷在如何評價和分析過去白區工作的問題上，較諸彭真在5月6日說的「我們的白區工作是失敗的」、「主要的不是客觀原因，而

¹⁵ 金沖及，〈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會議〉，《黨的文獻》，第2期(北京，1999.03)，頁33。

¹⁶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66。

¹⁷ 金沖及關於白區工作會議的文章，直接摘引當年的會議紀錄。金氏在論及會有「一種是認為不能根本否定劉少奇的報告，但仍有許多原則性的不同意見」時，提到的5月24日發言者雖然沒有具名，但是彭真即是在此日發言。更重要的是，比對金氏摘錄其人的部分發言內容，乃與彭真的官方年譜所披露的相關內容文字，完全吻合、一字不差。是故本文據以認為金氏例舉的這一發言者，就是彭真。金沖及，〈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會議〉，頁32-33。《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67-68。

是主觀的原因」，他在三週之後顯然是有所修正。這是否與此段時間經常聽聞其他白區代表控訴劉少奇簡單否定、抹煞過去地下工作成績有關，就不得而知了。總體而言，彭真認為劉少奇的觀點雖有不足，仍是瑕不掩瑜。他因此對於高文華等推行的反劉簽名連署活動，不予支持，並表示「少奇的意見對呀」。¹⁸

(三)6月1日至4日，張聞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白區工作會議的爭論。張聞天大發雷霆，對劉少奇的觀點多加批評；博古、凱豐也不予認同。劉少奇在高壓下生病高燒。3日，毛澤東發言並從中調和：一方面稱張聞天的報告是「非常好的」；另一方面，表示劉少奇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确的，錯的只在報告中個別問題上」，並表態同意「黨中存在著某種錯誤的傳統」的意見。毛還多方面稱讚劉少奇，認為過去對之無理打擊和不公正對待，「今天應該作出正確的結論」。¹⁹

列席政治局會議的彭真，在毛澤東講話的同日發言。現在公布的彭真講話內容，主要關乎他主張「要確保黨的領導」之下，重視和利用左派組織，也就是在現實的白區工作上「要反對關門主義」。²⁰至於彭真在5月24日所提的四點較小的不同意劉少奇之處，特別是黨內有無錯誤的「傳統」問題，在毛澤東發言表態後有無變化，目前無從而知。

在毛澤東出手相挺之下，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態度和緩許多，會議原先對劉的敵意氣氛也大為消逝。中共中央最後決定：劉少奇繼續作為派駐華北的中央代表，北方局則由楊尚昆、彭真等負責。

延安白區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和彭真政治意見相近(並非完全一致，而是同中有異)，雖然居於少數地位，但彼此形同合力奮戰。這無疑有助兩人之間進一步形成更緊密的政治關係和同志信任。但是劉少奇、彭真之間的政治合作關係，在愈加鞏固、強化之際，並非是自我封閉、排他拒外的。有論者就以為：經過白區工作會議爭論，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三十年政

¹⁸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206。

¹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冊，頁261。

²⁰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第1卷，頁93。

治結合的基礎」因此而「奠定」。²¹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也正是在這次延安會議，劉少奇在會前引領彭真與毛澤東見面，此乃毛、彭兩人的首次會面。彭真經由會議的近距離觀察，以及同毛澤東的直接接觸和密集談話後，對之的佩服感油然而生，再與時任的最高負責人張聞天相較後，彭真更進一步認為毛才是可勘負領導革命事業重任的領袖。²²彭真後來在中共高層(毛澤東、劉少奇面前)也曾表明他的此一心路歷程；²³他晚年念及此事，仍記憶猶新、感佩不已，甚至有自此認定毛為領袖而至死不渝之言。²⁴

對彭真而言，他視毛澤東為革命領袖的定位和伴之而來的敬崇之心，較諸他看待劉少奇兼是直屬上級、同袍夥伴，以及隨之而來的戰鬥情誼和敬重之感，是有所不同，但兩者並非彼此排擠、零和不容。這在毛澤東之後在延安大力器重劉少奇、放手重用彭真後，更進而巧妙地共處和結合。

四、中日戰爭初期北方局共事(1937-1938)

1937年7月，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共北方局改組，劉少奇、楊尚昆擔任正、副書記，彭真繼續留任組織部長。在戰事節節升高之際，彭真協助劉少奇向北方局所轄的各地黨委部署工作，特別是指示開展游擊戰爭和在山西及其周遭創建所謂的抗日根據地。

1937年12月中旬，中共在延安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從蘇聯回來、在共產國際任職並兼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並為會議所接受。毛澤東、劉少奇因先前強調獨立自主原則和游擊戰爭，而處於遭受批評的弱勢地位。12月底，劉少奇悻悻然地返回山西，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彭真聽聞王明的統一戰線主張後，向劉少奇提出疑問：「怎麼領導權也不要了？大革命失敗不就是因為不要領

²¹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98。

²²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頁98。

²³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3版，頁207。

²⁴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369。

導權嗎？」劉少奇回覆：「誰說不要了！叫你不要說嘛！」²⁵如此反映劉少奇對王明的政策主張大感不服、但按組織紀律卻不能公然違抗的內心掙扎和矛盾。

然而，劉少奇因為被王明批評而不便公開繼續堅持之事，反倒可經由彭真說出和落實。事實上，彭真隨後利用變通的方式，在1938年初向其行經的地方如冀豫晉、晉察冀進行秘密傳達，強調在國共抗日的統一戰線中，要「保障黨的政治和組織的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彭真由此提醒相關地方黨人，使之不致在與國民政府陣營和人員互動時喪失警覺，而仍能保持自主、見機擴張。

1938年2月21日，彭真抵達晉察冀與該地領導人聶榮臻會合。聶氏覺得亟需有人專管黨務，23日發電向劉少奇建議讓彭真「留此間任省委書記」。次日，張聞天、劉少奇聯名指示：「彭真留在晉察冀邊區工作」。3月中旬，劉少奇回到延安；毛澤東建議劉少奇留在中共中央，繼續指導華北工作。劉少奇與在晉察冀指導工作的彭真之間的工作指揮關係，主要透過電報往返。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發給晉察冀的指示文件，有些即由劉少奇起草。但要注意的是，這時劉少奇和彭真之間並非是簡單的上下單線聯繫，因為劉少奇發出的文電經常是與毛澤東或張聞天聯名，甚至是三人聯名。²⁶

1938年夏，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共產國際的口信指示：毛澤東在中共「為首」的地位以及其在抗日戰爭以來主張的政治路線，獲得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獲此政治全勝後，在同年秋冬之交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劉少奇、彭真皆參與此會；而兩人同在北方局的工作關係，在會後的新人事調度下也告結束。11月9日，中共中央發令新建中共北方局，楊尚昆代替劉少奇出任書記，彭真則被任命為中共北方局委員兼晉察冀分局(不久改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書記。相較彭真繼續返回晉察冀工作，劉少奇被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原局書記，指導所有長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地區黨的

²⁵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頁103。

²⁶ 鄧力群，〈我為少奇說些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66。

工作。²⁷他也動身前去華中，而不再過問彭真所在的晉察冀事務。劉少奇和彭真下次見面，恐怕就是在四年之後 1942 年底的延安。

值得注意的是，從 1937 年首次與毛澤東接觸而心生敬仰之心的彭真，聽聞 1938 年夏毛的領導地位被共產國際認證後，進一步地視之為正式的最高領袖，更在 1939 年初率先在晉察冀提出「毛澤東同志萬歲」口號。放眼中共各方屬地，彭真是最先喊出毛「萬歲」的地方領導人，並且自感光榮。²⁸ 他還特地囑咐晉察冀的幹部：到延安後，「不要跟錯了人，要緊跟毛主席」。²⁹ 由此可見，彭真即便對工作表現出色的先前北方局上級劉少奇有佩服、敬從之意，恐也無法與他對毛澤東的心懷崇仰、甘心臣服相提並論。更何況，中共高層內出現要對劉少奇「正位」的政治輿論，要到兩年以後的 1941 年秋；劉少奇在毛澤東一人之下的「二把手」地位，真正在組織上落實和呈現，更要到 1943 年 3 月中共中央改組，成立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的中央書記處。在此之前，毛澤東和彭真之間已有直接的互動和近身的相處，於公於私關係皆已非同一般。

五、中日戰爭後期共處延安(1943-1945)

1941 年初，中共中央電令彭真前來延安，準備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七大」）。彭真在 1941 年 5 月初抵達延安；在毛澤東的細心關照下，劉少奇則是 1942 年 12 月 30 日返抵延安。在劉少奇回到延安之前的一年半載的時間，彭真和毛澤東兩人之間的政治關係，直是急速發展和升溫。

首先、毛澤東安排彭真在中央政治局和延安各機關作關於晉察冀的工作報告，並譽之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其次、毛讓尚未具有中央委員資格

²⁷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上卷，頁241-242。

²⁸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第51期（香港，2013.04），頁137。

²⁹ 李葆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中國人民銀行編，《李葆華紀念文集》（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頁366。

的彭真，經常列席參加中央高層會議，並在其參加 1941 年 9 月的高層整風後同時出任清算黨史問題的歷史委員會和檢查受錯誤批判幹部的審查委員會。第三、1942 年初，毛澤東決定發起整風運動，並將聚集中央重要幹部和各地黨代表的中央黨校作為整風重點單位；毛要彭真以黨校教育長的身分，直接負責中央黨校的整風運動和日常工作。彭真在中央黨校按部就班地推行整風學習、開始試行審幹和反奸，為毛所喜，進而在 1943 年 3 月毛親任中央黨校校長時，被選任為副校長。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無論是先來延安的彭真還是後到的劉少奇，都是最擁護毛澤東的積極分子和為毛所倚重的主要幫手。這無論從時人時語、親歷者後來的回憶，以至研究者的觀察，皆可以得到如是的觀感和論斷。³⁰ 在高層整風方面，劉少奇、彭真在毛澤東的政治旗幟下，各盡其職地努力參加批判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和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劉少奇站在理論的高度，自上而下撻伐相關人士的路線錯誤；彭真除了親自上陣批鬥，也糾集中央黨校內的人員隊伍和揭發資料，從外而內地對之砲轟、施壓。劉少奇、彭真等人齊力貶抑兩個「宗派」的同時，大大抬高毛澤東，使之在黨內政治上、思想上達到無人可比的至尊地位，如同「紅太陽」般在陝北高原冉冉升起。

劉少奇在中央高層砲打錯誤的政治路線和代表人士時，他回顧並舉出「過去黨內鬥爭傳統」的不好實例（1943 年 10 月 6 日），也不避諱地連帶批評「六大以後的順直省委變成清談俱樂部，不做任何工作」。³¹ 當時實際負責順直省委日常工作、後來因劉少奇斷然取消省委而失去省委職位的彭真，在座聽聞到此，不知作何感想。

對於由整風運動順勢發展成的審查幹部和清查內奸運動，劉少奇和彭真也有密切的工作關係。劉少奇為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彭真為其委員（另兩位委員為康生、高崗）。劉少奇在延安審幹反奸中的面貌和角色，因其位居在上、身處幕後而顯得較為模糊。但是他知曉、贊成審幹具有「清

³⁰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19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74-75、106、201。

³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30。

查內奸，爭取失足者，訓練幹部」的任務，也曾演講號召。³²彭真領導中央黨校審幹運動、具體處理校內人員審查問題，其激進的政治言行則比較清楚可辨。在審幹「搶救」的個案上，例如：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慶施，以及在中央黨校學習的河南黨人危拱之。劉少奇和彭真皆有經手處理，甚至存有協作分工。對於柯、危兩人以至更大範圍的黨員幹部在運動中遭難和受害，劉少奇、彭真皆難辭其咎。³³

但是如果將審幹、反奸簡化說成是劉少奇、彭真所夥同包辦、一手遮天，恐也非事實。因為毛澤東對整風、審幹和反奸的進程瞭若指掌，運動的收放、張弛，也繫乎其之一心。毛澤東後來也自承對整風、審幹過激要負的責任，較劉少奇為大。³⁴事實上，彭真在中央黨校大張旗鼓地「搶救失足者」後，發現情況有失控之虞，也是逕向毛澤東反映，而非向劉少奇報告。³⁵

在此階段彭真和劉少奇之間的政治互動和相互定位，乃置諸以毛澤東為樞紐核心的政治框架之內。劉少奇在黨內作為「二當家」的地位尚未確立以前，彭真曾在中央會議上對之讚揚。1941年9月的高層整風期間，多位政治局成員如任弼時、王稼祥、陳雲、康生對劉少奇讚譽有加。尤其是陳雲不但聲稱「劉少奇同志是代表了過去十年來的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更提出「劉少奇將來地位要提高」。³⁶彭真在陳雲發言的隔日(9月12日)，回顧「華北鬥爭的歷史」時也表示：劉少奇旨在批判「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的〈肅清立三路線殘餘〉(發表在1936年4月10日，此時彭真尚未擔任北方局組織部部長)，「在華北起了很大作用。因此，一二九學生運動取得很大成

³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29。

³³ 柯六六，〈延安審幹運動中的柯慶施——來自親歷者的回憶〉，《江淮文史》，第2期(合肥，2012.03)，頁78、84。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下冊，頁334。程光，《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頁182。

³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204。

³⁵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1卷，頁275。

³⁶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上冊，頁328-329。

績」。³⁷此刻剛落腳延安、不具中央委員身分的彭真，自然無法像陳雲一樣有權對中央人事發表高見，但其以親歷者的身分為劉少奇的歷史作用證言，也多少算是為之進行政治造勢。毛澤東對會上這股讚許劉少奇、甚至主張要提高其黨內領導地位的聲音，雖沒表示態度，但了然於胸、予以肯定。³⁸

劉少奇作為黨內「二當家」的地位，1943年初在毛澤東襄助下獲得確立以後，彭真自是接受和附和。彭真在中央高層會議討論黨的歷史時，結合自身的發展歷程和成長經驗，有感、有幸於(或亦有標榜之意)先後受到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指導和教育。彭真表示：「出獄後，遇到一二九運動，所以沒有犯錯誤，是由於少奇同志去領導了」；之後「在路線學習時」，因受「毛主席」的啟發，「才使我思想上有了轉機」。³⁹但值得注意的是，彭真在同時表現出對毛澤東、劉少奇的尊崇之意時，其實還是有等次高低之分。彭真實際主持的中央黨校內，就對於「一種所謂黨內有蘇區、白區兩個領袖的說法」加以批判。⁴⁰或因為這一說法將中共的發展情況加以簡單劃分並二元割裂，而且隱含了作為白區領袖的劉少奇可以和蘇區領袖毛澤東平起平坐的意思。如此主次不分、認識有誤，因而要嚴加正視和撻伐。這也反映彭真歷經延安整風的「薰陶」，更加持以「毛主席副」的政治意識。

彭真除感佩毛澤東的領袖風範、視野和高度，也應會感戴毛澤東在1940年代中期對之不次拔擢。在中共行將展開大規模的審幹反奸的背景下，1943年3月11日，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病假休養，該部的「重要問題請示劉少奇處理」。⁴¹一年之後的1944年3月5日，毛澤東提議由彭真代理中央組織部部長。⁴²雖不能排除毛澤東做出相關決定時曾徵詢劉少奇的意見或受之影響；但毛可能更多基於欣賞彭真在領導中央黨校整風審幹近兩年的過

³⁷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1卷，頁249。

³⁸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274。

³⁹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277。

⁴⁰ 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418。

⁴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卷，頁414。

⁴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上卷，頁381。

程中，嚴密過濾、有效培育大批毛的忠貞分子，從而穩固毛在黨內上層的統治基礎，因此放心地進一步將組織大權委交於之。同年中，中共決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員會，在毛起草的中央指示中，明定彭真為其主任。⁴³彭真的工作重心也逐漸從中央黨校轉移至中央層級。

1945年的中共「七大」選舉中，毛澤東出面為忠實貫徹其審幹反奸政策而招致人怨的彭真說項和緩頰，讓之順利選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⁴⁴尤有甚者，同年8月23日，為赴四川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作準備，毛澤東決定其不在延安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席職務，並要中央書記處在「七大」選出的「中央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以外，另推陳雲、彭真為候補書記，讓書記處繼續「有五人開會」（周恩來陪同毛前赴重慶）。毛的提議旋即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⁴⁵由此，彭真進入當時中共權力金字塔的最頂端，其在書記處的排名雖然在劉少奇之後，但也算得上是書記處的同僚。對劉少奇而言，在延安時期黨內地位大幅躍升的彭真，不再僅是他的黨內部下而已，同時更是毛澤東身邊的政治紅人和股肱重臣。

綜前所述，在毛澤東的悉心安排下，在抗戰後期的延安，劉少奇躍升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地位僅在其之後；彭真也獲毛澤東的破格拉拔，地位迅速晉升。劉少奇、彭真各自因故對毛澤東甚為感激，並自然皆首重維繫、經營自身與毛澤東直接的政治關係和信任。其次，劉少奇、彭真都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厲行整風、審幹，大整任何存在或僅屬臆測的黨內「宗派」和「山頭」，促使各級黨幹歸順在毛澤東的一人領導之下。在心細如髮的毛澤東的眼簾下，劉少奇、彭真豈可能戮力推行毛氏整風、剷除「宗派」和救平「山頭」的同時，如有論者所言的兩人暗自將所謂「劉少奇系統」變成黨內最大的「山頭」之一？⁴⁶若再考慮劉少奇略帶孤僻、自傲的性格，以及

⁴³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368。

⁴⁴ Teiwes C. Frederick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354.

⁴⁵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下卷，頁11-12。

⁴⁶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頁382、388。

他律己甚嚴、人如其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自我要求，⁴⁷他又有多少可能會將彭真視作自身「系統」的「第一號大將」？就算劉少奇心有此想，彭真又會奉迎、買帳嗎？

六、國共內戰中央工委共事(1947-1948)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告投降。國共兩黨一方面在重慶舉行和談，另一方面，各自暗中又積極調兵遣將，期以有利談判的進行或是藉機取得談判無法取得的利益。由於搶佔東北地區的政治和戰略重要性，中共黨內高層如康生、高崗皆請纓出馬。因毛澤東在重慶談判而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劉少奇，經由電報往返與毛澤東、周恩來密集商議後，決定提議彭真擔任「最負責人到東北去領導」，亦即由其擔任東北中央局書記，「代表中共中央全權領導東北黨和中共組織一切活動，並處理一切問題」。⁴⁸

1945年秋冬，因為毛澤東在渝談判以及工作緊張而病發休養，劉少奇兩度代表中共中央對在東北的彭真進行指揮和聯繫。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在9月底和11月下旬，皆指示彭真在東北採取分散發展的方針，也就是不要集中在中心大城和交通要道發展，而是要著力經營周邊和農村。彭真卻沒有按之執行，反之，他對毛澤東在10月中提出的「獨霸東北」方針，欣然接受、堅持繼續貫徹。劉少奇到12月下旬見彭真仍然遲未調整政策和另作佈置，甚至曾以個人名義電告彭真：「東北情況，我不會比你更清楚，但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⁴⁹從上述彭真對劉少奇工作指示的未予理睬，除了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實也反映了作為中央書記處一員的彭真，當時在重大政策問題上未見得全然對「二把手」劉少奇言聽計從，而是有自我主張、甚至自認更符合毛澤東的真心

⁴⁷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5年3月。

⁴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冊，頁522-523。

⁴⁹ 〈劉少奇關於應以主要力量建立東、西、北滿根據地致彭真電〉(1945年12月24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15冊，頁512。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期(臺北，2016.03)，頁104-107。

實意和戰略構想。

1946年上半年、直到四平決戰結束以前，中共中央(毛澤東為主、也包括劉少奇在內)對彭真的指示，主要是集中兵力拼敵、奪佔要城，以造成既定的政治事實，以達成與國府在關外各據一方、分庭抗禮的態勢。然而，因為四平之役共軍死傷嚴重需要有人負責，再加上東北黨人中不滿彭真流連大城市者如林彪、高崗和陳雲，聯名向延安中央告狀，彭真成為眾矢之的，6月中旬被中共中央(劉少奇起草、毛澤東修改)調作副職，失去了對東北局的領導權。

彭真在林彪為首的新改組東北局中被邊緣化，參與管理城市工作和地方土改。194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致電東北局(劉少奇起草電報，⁵⁰代表毛澤東亦知情同意)，要彭真率團參加全國土地會議。3月底，由於陝北戰情吃緊，中共中央機關決定分開行動：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續留當地，劉少奇、朱德移轉他地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4月11日，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來電，其中提到「將來康生、彭真參加土地會議後，亦留中央工委為常委」。⁵¹其代表了從東北繳羽而歸的彭真到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工作，乃經毛澤東認可、甚而是由之主動安排。7月上旬，彭真抵達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這是彭真和劉少奇睽違近兩年後再次一起工作。既然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彭真已確認在中央工委任職；劉少奇不久之後聽聞林彪、高崗、陳雲為首的東北局託人嘗試說明他們先前與彭真的爭論，也就顯得意興闌珊，反而要求對方不要落井下石、以團結為要。根據後來高崗的自白：他原本尊重和信任劉少奇，但由此認為劉在東北問題上有些袒護彭真，才因而對之產生隔閡。⁵²

毛澤東託付劉少奇領導的中央工委的主要任務是：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和指導晉察冀工作。劉少奇要彭真協助處理此二事，分述如後：

一、7月中旬至9月中旬，全國土地會議召開。此會是在毛澤東遠方

⁵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頁68。

⁵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頁73。

⁵²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43。

緊盯下，由劉少奇具體主持和規劃，彭真也參加與會。劉少奇對先前土地改革「不徹底」的估計，以及其主要是為數許多的基層幹部「不純潔」所造成，因而急需普遍整黨的看法，還有毛澤東親令的平分土地新方針，彭真在會議期間不但悉數同意和接受，更進一步提出激越的「走貧僱農路線」和「勢必要推平富裕中農」的主張。⁵³

二、劉少奇在 1947 年春夏之交視導晉察冀後不甚滿意，認為當地的土改先過於保守而後又急轉偏激，既與地方幹部的嚴重不純淨有關，也歸咎其上級聶榮臻的領導無方，劉更因此曾在全國土地會議期間面斥之「佔著茅坑不拉屎」。⁵⁴會後，為整頓晉察冀工作並同時落實土改新方針，劉少奇借重彭真之力，或鑑於後者在抗日期間曾作為晉察冀的重要負責人，可說是適才適所的明智決定。但劉少奇很注意事先向毛澤東請示，以取得其認可。最後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起草)劉少奇的建議，讓彭真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資格前去「幫助與指導」晉察冀工作。⁵⁵

彭真也不負所託，1947 年秋冬急如星火地在該地推行上層整風和下層整幹。劉少奇顯然很滿意彭真主導的晉察冀幹部整風的成果，他在 12 月 14 日呈報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指出：晉察冀「中央局威信大增，一切無原則糾紛突然停止，黨內空前團結，幹部信心大大提高，群眾已開始活躍」。劉少奇將這一超乎原先預期的迅速變化，歸功於彭真，強調後者「是很有能力地去實行了這個轉變」。⁵⁶

另外，彭真在晉察冀強力推銷全國土地會議分地方針之餘，雖也曾提醒劉少奇「當前最主要的危險是可能產生急性病」，初步引起其對運動過激的警覺；但是 1947 年底由彭真促成、捲起的晉察冀土改風暴，為時也長約二十幾天，⁵⁷恐要到 1948 年初毛澤東逐漸形成並明確提出土改「在群眾已經認真發動和已經展開鬥爭的地方，必須防止『左』傾」，⁵⁸方才告緩、停

⁵³ 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147、326、330。

⁵⁴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頁257。

⁵⁵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483-484。

⁵⁶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503-504。

⁵⁷ 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頁184。

⁵⁸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第2卷，

歇。

1948年春，毛澤東在肯定全國土地會議和其後運動大有成績的前提下，也批評相關領導中存有失誤和失責。主其事的劉少奇也按此政治標準和口徑檢查土改過程中出現的不良和過激現象。針對彭真「幫助與指導」下晉察冀的土改和整黨，劉少奇指出：晉察冀的錯誤次於晉綏地區，但「毛病亦多」，雖幸得修正而未讓之繼續發展、「損失還不大」，「然而結果不能說是很好的」。劉少奇自承對全國土地會議的缺點和錯誤要負責，但也強調不是「各處『左』的偏向錯誤就是我的主張」。劉少奇進而表示：全國土地會議中，「有個別人也提出些不正確的口號」，例如「貧僱農路線」等，但他「做結論時也未加批評或批評得夠」。⁵⁹劉少奇對「貧僱農路線」提法的批評，就算不全是專對彭真而來，應也含括其在內。

彭真見到土改問題叢生和聽到劉少奇發話批評後，1948年先後在中央工委和中央高層會議檢討。彭真坦言先前對晉察冀土改「不徹底」和幹部「不純」的評估過於嚴重；也從全國土地會議上主張的「勢必要推平富裕中農」，改為「富裕中農多餘土地不經同意不得平分」（其強調「這是讓步，即靈活性」），並承認「過分地給貧雇農撐腰也捎帶壓了中農」。⁶⁰

1948年4月中旬，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抵達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同月底，舉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通稱城南莊會議），中共中央「五大書記」重新合體，彭真也出席此會。這是他與毛澤東延安一別、相隔兩年多後，首次一起開會。劉少奇領導、彭真參與的中央工委，不久也被撤銷。自此至1949年初中共「進京趕考」以前，有關彭真的新工作安排和政治任命，包括：在按劉少奇提議合併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區新成立的華北局中擔任常委（5月6日）；獲命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兼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5月15日），以及中共北平市委書記（12月13日）。無一沒有經過毛澤東的審定、甚或是由他代表中央起草相關的人事派令。雖不能排除劉少奇在

頁843。

⁵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下卷，頁139、141。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1948年9月13日），《黨的文獻》，第5期（北京，1989.09），頁8。

⁶⁰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卷，頁509、514-515。

其中有一定的建議權、影響力和積極性，但簡單說成是因其「包庇」和「操縱」的結果，⁶¹根本是嚴重失實並視毛澤東的權威為無物。此外，以毛、劉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彭真有關新職的政治考慮和重要共識，自然還有希望借重他較擅長的組織人事、政策參謀，以及城市工作的能力。

七、中共建政初的「高饒事件」風波(1953-1954)

中共建政初年，劉少奇在社會主義過渡問題和相關的具體政策上，與毛澤東的看法多有出入；相對地，高崗的意見多與毛相近、甚而吻合。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耐和不满，以及對高崗表現出來的格外器重和信任(讓之1952年底出任與政務院平級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即是所謂「高饒事件」的重要背景。

高崗批評、攻擊劉少奇，除了其自認是為毛澤東「清君側」、為其所不好明言之事，高崗還有一個極其強烈的個人動機：他認為劉少奇在1945、1946年的東北爭論問題上偏袒彭真，之後也罔顧原則地對之任用。時至1953年，高崗聽聞劉少奇擬議將來由彭真擔任政府黨組書記的消息後，更是不滿，覺得劉少奇用人唯私、彭真德不配位，在高層間更是積極地散佈劉少奇有其個人的「圈圈」，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為其要員；再不制止以劉為首的「白區黨」，將有架空中央主席權力、被之把持朝政的危險。這也是該年夏天中央財經會議「批薄(一波)射劉(少奇)」和入秋後中央組織工作會議「批安(子文)伐劉(劉少奇)」的由來。

彭真也不甚好過，與高崗立場一致的林彪，表態反對彭真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⁶²值得一提的是，任弼時養病和其1950年去世後，中央書記處內分工負責管理中組部工作的書記就是劉少奇。⁶³不知劉少奇曾否為彭真美言、嘗試助之保留中組部部長職位；但正是劉少奇建議、提名饒漱石取代

⁶¹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1967)，頁10。

⁶² 王漢斌口述、韓勁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北京，2012.10)，頁73。

⁶³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66。

彭真，出任中組部部長。⁶⁴彭真交出「吏部尚書」一職後，接替其位的饒漱石也來意不善。

到中組部「新官上任」的饒漱石懷疑：副部長安子文在部內盤根錯節和膽大越權，乃因其與前部長彭真關係匪淺、甚而不正常所致。⁶⁵饒漱石也由此而發，與劉少奇數次交談彭真、薄一波的「宗派主義」問題，並直言劉也應對他們嚴加批評。針對饒漱石的質問和意見，向來律己的劉少奇不禁反問：「你是不是感覺我這樣？是不是你感覺我沒有劃清界線？」⁶⁶此外，在同年內，北京市的部分建築工人因為覺得待遇不同、不公而情緒波動，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在處理此事、提出對策時，也屢遭在中央主管工資事務的饒漱石、甚至是主持計劃工作的高崗的不予配合和刁難。⁶⁷

由於高崗行事魯莽，造成中共高層人心浮動、政局不穩，1953年底，毛澤東決定離棄高崗並將饒漱石一併陪綁、批鬥。毛也要求其他高級幹部如劉少奇、彭真在1954年的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上公開作自我批評。劉少奇在政治上好不容易化險為夷，他既努力做好自我的檢討，也督促彭真虛心檢查自身的錯誤，尤其是毛澤東特別交代後者檢討的東北問題。彭真苦盼到高崗倒臺，除了想藉機推倒高崗等人數年來對之東北問題上綱上線的指控，更意欲強調其在關外自始至終堅決執行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意旨和政策指示。然而，劉少奇退回彭真的檢討原稿，找之兩次談話外，更要彭真當年在東北的另一主要爭論對象陳雲「幫助」彭真作好檢查。彭真在劉少奇、陳雲的緊密施壓下，縱使心有不願，最後也自承在東北犯有「路線性」的錯誤。

劉少奇力促彭真深省檢討其東北錯誤，其目的可能有：首先、此乃毛澤東交代的政治任務，劉少奇自當積極貫徹而不管當事人彭真的內心所

⁶⁴ 〈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問題〉(1952年7月15日、18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第4冊，頁333、335、337。鄧力群，《鄧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頁251。

⁶⁵ 景玉川，《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頁229-230。

⁶⁶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頁370-371。

⁶⁷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甲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年7月。

望；彭真在東北問題的性質，毛過去已將之定性為「路線性」錯誤，就劉看來，彭真檢討當然必須按之而行、寸步不離。事實上，彭真按此政治口徑、標準進行檢討，也可為當年確實高度涉入、驅使影響彭真東北言行的毛澤東開脫個人責任。其次、如前所述，彭真在 1945 年秋冬並不太重視、理睬劉少奇以中央名義對之所作的政治指示；劉少奇或因此在 1954 年也有其個人動機逼壓彭真反覆檢查。第三、高崗對劉少奇心生怨恨，正源自其覺得後者在東北爭論上偏袒彭真。劉少奇嚴逼彭真就此問題一再檢討、重寫，或想正本清源，並凸顯他未對彭真袒護和徇私。⁶⁸

在高崗、饒漱石「活動」、「生事」期間，劉少奇和彭真沒有互相拆臺：在被指稱是「批薄射劉」的財經會議，彭真也加入批判薄一波的行列(批薄者眾，不限高、饒)，但其就事論事，沒將批判指向劉少奇；⁶⁹饒漱石針對組織工作，曾向劉少奇反映其對彭真的狐疑和批評，劉少奇也為彭真加以解釋。⁷⁰

更重要的是，「高饒事件」對劉少奇和彭真之間往後關係的發展，提供的或還有一個重大的政治警訊：高崗、饒漱石倒臺前分別針對劉少奇、彭真兩人關係所作的結派、成黨的政治指控，在中共高層黨內獲得不小的迴響。高、饒政治垮臺後，劉少奇和彭真對於兩人之間的政治關係和互動，會不會因而有一小心慎重、特別提防的心思，以免落人口舌、被人再作文章？另外，高崗被指責私下在高幹間封官許願、拉幫結派，從事非法的「小組組織活動」，高崗、饒漱石更被毛澤東定罪為私組反中共中央、反毛的「反黨集團」而不可饒恕。劉少奇和彭真喜聞樂見高、饒跌入不可復返的政治深淵的同時，他們彼此之間的政治往來，恐也深深以之為戒，以免將來在不小心的情況下重蹈其覆轍。⁷¹

⁶⁸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131-132。

⁶⁹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5年3月。

⁷⁰ 景玉川，《饒漱石》，頁261-262。

⁷¹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5年3月。

八、從中共「八大」到「大躍進」運動(1956-1960)

(一)「八大」權力格局下兩人的相對位置

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帶領中共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只要毛決定加快速度，劉少奇和彭真無不衝刺快跑。1956年經毛、劉的事先審可後，彭真報喜般地宣布首都北京市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引領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在此背景下，中共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八大」)，調整中央機關並配置新的人事。

中共的首腦決策機關中央書記處，在「八大」改制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並另設一個中央書記處以協助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原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以及任弼時死後補上的陳雲轉任常委會；同時毛膺任黨主席，劉、周、朱、陳擔任副主席。新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也入常委會，並負責領導新設的中央書記處，彭真則是鄧小平在書記處的副手。

「七大」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彭真，與「八大」常委會失之交臂。馬若德認為：這不但是彭真個人、無疑也是與之工作關係密切的劉少奇的政治挫敗。因為如果劉少奇可以自行決定，他會選擇自己的「主要黨羽」彭真而非鄧小平「入常」、擔任中央總書記；毛澤東成功拉拔鄧小平，令之佔有相關職位，使得劉少奇如與毛發生爭執，他無法再將獲得「黨機器」的堅定支持視作理所當然。⁷²

但更接近事實的觀察是，彭真未能「入常」，主要肇因於他在1940年代前半期延安整風審幹和1940年代中期東北局爭論樹敵太多，甚而影響、牽制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用人思考和部署。⁷³即使如此，彭真在中共「八大」以後的政治地位，僅在中央常委(原有6名，1958年又增選了林彪)

⁷²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146.

⁷³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121-122。

之後，故有「彭老八」之稱。事實上，彭真到「文革」以前皆參與中央決策並職司執行，猶如「不是常委的常委」和實質的「副總書記」。這不可能全是劉少奇一手操縱的結果，因為沒有毛澤東的允許和支持是不能想像的。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黨外人士通報彭真的政治錯誤時表示：「我們是要把他培養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對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⁷⁴這顯示彭真在「文革」前十年的位高權重，並非只是劉少奇的個人喜好所致，事實上，同時也是毛澤東對彭真長期特意政治栽培的心意。

從彭真方面來看，他恐與其他多數中共高幹無異，皆注意到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上代表中央作政治報告，被選為排名首位的黨副主席，以及排名僅在毛澤東一人之下的中央常委，似已擺脫三年前高崗對之「鬧事」的政治陰霾，繼續穩坐「二當家」位置，未來也是最可能接毛澤東「班」的人。此感在1959年劉少奇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後，更應是有增無減。

劉少奇和彭真雖然結識多年、工作密切，但是私人往來卻不多。這可能與劉少奇個性拘謹、不好同人交往有關。劉少奇即曾自言沒有與誰的關係特別好。⁷⁵相對地，彭真對劉少奇是敬而不親，除了因為劉少奇嚴肅、不好親近的性格因素，以及彭真以下事上，也不便對劉少奇套近乎、攀親道故，或還有一個重要的解釋：彭真在政治上並不自認僅是劉少奇一人的「助手」，而是自我定位為毛澤東領班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其中，毛澤東在劉少奇之前、更為重要；劉之後尚有周恩來和鄧小平）共同服務的「助手」。⁷⁶

（二）整風、「反右派」和「大躍進」

中共宣稱進入社會主義時期後，毛澤東認為國家可否長治久安，主要繫乎中共能否自我革新、整飭吏治，為此更在1957年發起整風運動。馬若

⁷⁴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27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源）。

⁷⁵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乙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15年3月。

⁷⁶ 馬句，〈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前線》，第10期（北京，2012.10），頁57。

德以為：毛澤東和劉少奇在整風運動的構想和方式上存有重大的差異，前者希望開門借用、引進黨外聲音和群眾力量，後者則偏好黨關門進行內部學習和整頓除弊。更繪聲繪影地指出劉少奇和彭真合謀抵制毛澤東的相關政策倡議，並強調由此看來兩人與毛之間的政治不諧和早已有之。⁷⁷然而，此說恐失於渲染誇張和不符事實。

在整風思路和構想上，劉少奇的想法相較於毛澤東縱有些許出入，但是「不可能在原則上表示反對」。⁷⁸這在毛的態度愈加鮮明後更復如此，遑論對之施加抵制云云。彭真在整風運動正式開始的前後，即在北京市積極響應、勤快佈置，還因此受到中央表揚，根本不存在什麼陽奉陰違、不聽號令的情況。整風運動後來加入「反右派」議程，從「引蛇出洞」到全力反擊的發展和轉折，也未聞劉少奇、彭真有過任何異見。彭真偕同鄧小平高效地貫徹毛澤東在運動各階段的意圖，不但把黨外人士和知識分子整得七葷八素、苦不堪言，其砲火四射也遍及各地，同時還在黨內開闢一個規模不小的「反右」戰場。⁷⁹

正由於鄧小平、彭真為正副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整風、「反右派」中對毛澤東運動指示的令到行止，讓後者覺得如臂使指、方便好用。1958年初，毛對政府系統1956年的「反冒進」經濟政策大加聲討(原本支持「反冒進」的劉少奇，應聲反過來對之批判)，他決定由中央書記處監管政府工作並推動「大躍進」運動。彭真因此得以開始參與過問國民經濟的領導工作。

對於「大躍進」大大脫離現實的政策構想，劉少奇不但加入浮想聯翩的行列，還成為其強而有力的鼓吹者。對於本已不符實際的「超英趕美」期程目標，劉少奇喜不自勝地向下表示可以縮短時間提前「趕上英美」、⁸⁰進而能「趕過整個歐洲(包括蘇聯)」，更宣稱：「中國進入共產主義，不要好久，

⁷⁷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184-199.

⁷⁸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500-501。

⁷⁹ 鍾延麟，〈彭真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6卷第2期(臺北，2014.06)，頁247-292。

⁸⁰ 〈少奇同志七月四日在石景山鋼鐵廠的情況〉(1958年7月4日)，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1，目錄號015，案卷號00164，頁10-11。

你們大多數可以看到共產主義」。⁸¹劉少奇對農業大增產、大豐產的消息不疑有他，還認為既然如此，農地種植一半即可，另一半可以休耕；⁸²在人民公社醞釀的過程中，劉少奇對之的運作設想也吹得天花亂墜。⁸³相對於「頭腦發熱」的劉少奇，彭真實也不遑多讓，他同樣盛讚農業的生產奇蹟，更直接出面負責監督中央相關部會和各地限期完成大煉鋼鐵的指標。1958年夏秋，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農村快速鋪行，問題隨之而起並引起毛澤東的關注；劉少奇和彭真不約而同地仍繼續主張按原先的規劃，在數年之後即要將農村公社進一步推向全民所有制，一度顯得比毛澤東還狂熱、迫不急待。⁸⁴

1958年底至1959年中，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對「大躍進」進行「糾偏」，同時盡可能地維持其熱勁。在此過程中，劉少奇、彭真緊隨毛澤東的步伐和口徑。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因為批判彭德懷，將中共正在進行的「糾左」反轉為「反右傾」，更進而掀起第二回的「大躍進」。劉少奇、彭真熱烈響應毛澤東的政治號召，在廬山上狠批彭德懷，下廬山後也齊力共推浩浩蕩蕩的「反右傾」運動，讓對「大躍進」心有狐疑者噤口難語。1959年底起的農村人民公社向更高的發展階段搶先過渡，以及1960年初的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劉少奇和彭真都為之鼓勵叫好；1960年下半年因為中蘇關係對立公開化，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借力使力大煉「爭氣鋼」，同樣參與決策的劉少奇、彭真也無異議。綜上所言，三年「大躍進」期間，劉少奇、彭真皆是毛澤東「烏托邦」狂想炙熱程度不相上下的追隨者。

⁸¹ 〈少奇同志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談話〉(1958年7月5日)，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1，目錄號015，案卷號00164，頁62。

⁸² 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頁110。

⁸³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卷，修訂本，頁756-757。

⁸⁴ Yen-lin Chung,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74(2015), 132-134, 137-138.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3卷，頁357-358。

九、經濟調整時期(1961-1962)

「大躍進」運動造成的大規模死亡事件，在 1960 年底終於紙包不住火，驚動中共中央。「大躍進」到 1961 年也難以為繼，中共不得不進行多方面的政策調整。中共主要領導人分別深入基層調查，急於為解決經濟危局尋找解方。中共中央在 1962 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對造成嚴重問題的「大躍進」進行檢討。

劉少奇在會議期間勇於突破當時的政治界線，例如：未依照毛澤東設定、慣用的運動成果評比(成績佔有九個指頭的比重，存有的問題僅是餘下的一個指頭而已)，也突出強調「人禍」肇事的因素，從而抒發與會幹部的情緒並活絡討論的氣氛。與此同時，劉少奇雖也小心翼翼地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威信和「總路線」的正確性，但是可能毛仍認為劉的相關言論並不悅耳和令之寬慰。

彭真在「七千人大會」期間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其指出毛澤東在「大躍進」中有錯誤、要檢討一事。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在討論「大躍進」錯誤的責任問題時，彭真表示：

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⁸⁵

對此，中國大陸政界元老(如薄一波)或是研究者多予稱讚，認為其有敢言的勇氣；有論者則意有所指地暗示：彭真作為劉少奇的「頭號大將」，其講話

⁸⁵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08。

向毛澤東究責的背後，恐有劉少奇指使的影子。⁸⁶然而，前述兩種論述和評論，皆流於表面和簡單，而另有其他較具可能性的解析和詮釋。

首先、鄧小平、彭真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事前曾上呈給毛澤東一份工作檢討報告，其中積極攬責在身，同時高度肯定毛澤東領導的正確。鄧小平、彭真如此悉心護主，反而讓毛澤東覺得不好意思，強調「不要怕講我的缺點」。毛澤東對此的清楚明示，是彭真膽敢發言說毛有錯的重要背景。其次、細究彭真提及毛澤東的具體錯誤問題，皆是「大躍進」過後毛曾在黨內作過自我批評的事項，彭真並無越界多提。再次、彭真提到毛已自我坦承不諱的錯誤，意要突顯毛的領袖威信崇高依舊，還可能因其正視己過、知過能改，而更為人所佩服、敬仰；下級一味對之迴避、遮掩，反而欲蓋彌彰、無法取信於人。坦率言之又點到為止，才是真心維護領袖之正策。無論是基於上述推論或是根據其他的口述訪問所得，都不無存在一種可能：或是毛澤東本人示意彭真為之。⁸⁷

過去較少關注的是，彭真在提到中央集體、毛澤東個人有錯之時，也提到要包括劉少奇的錯誤。彭真發表相關言論之時，毛本人並不在場，劉少奇則是當面在座。對於彭真直率的發言，劉少奇聞後只表示中央較諸地方責任為先、為重，而無檢討其自身所犯的錯誤。⁸⁸

彭真在「七千人大會」期間評及毛澤東錯誤的相關言論說出口後，短時或是較長的時間之內都沒有跡象顯示毛澤東對此生氣；即便 1966 年彭真被毛澤東下令打倒以後遭到全面否定，其從政歷史被翻箱倒櫃地徹查多遍，彭真在「七千人大會」評毛談話一事也從來沒有被翻出來批判。事實上，「七千人大會」結束後，在 1962 年上半年的經濟調整階段，彭真是中央「一線」領導人之中政策主張與毛澤東最為相近者；相對地，這也是彭真與劉少奇共事以來政策殊異最大的一個時期。

⁸⁶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90。

⁸⁷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89-93。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148-149。

⁸⁸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09。

「七千人大會」之後的經濟調整工作，劉少奇對陳雲的倚重、對經濟情勢的估計，以及相對應提出的政策，彭真都不無有自己的看法。

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領導中共中央「一線」領導人進行經濟調整。劉少奇聽取中央財經官員的匯報時，驚覺國家經濟存在的問題比原本設想的還更加嚴重。陳雲對整體情勢的估判和提出的具體對策，劉少奇多有同感，認為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在上述過程中，彭真不隱瞞自己的不同意見，但劉少奇並沒有予以接受。例如：彭真認為不應獨厚陳雲的經濟主張，也須同時傳達其他經濟官員的講話；劉少奇認為陳雲講話甚為實用，要專門下發給各級幹部閱讀。對於陳雲認為經濟情勢繼續惡化的估計，彭真不表認同，更直言這不同於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的「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的估計。劉少奇聞後不以為然，仍舊贊同陳雲的看法，更主導採用了「非常時期」的提法，以概括、凸顯嚴峻的經濟情勢。針對彭真和自己的觀點殊異，劉少奇也一度考慮將之明白寫入中央轉發陳雲等人關於經濟問題講話的指示。⁸⁹

劉少奇除了認同、支持陳雲的經濟情勢看法，更同意讓陳雲重掌經濟決策大權。陳雲的經濟管理權力在 1958 年「大躍進」伊始時，經過毛澤東的安排已轉交給中央書記處掌握。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經常協助或代替鄧小平對經濟問題進行「具體部署」，他甚至會召集經濟部門官員到其住處議事。陳雲在劉少奇的支持下，重拾過問經濟決策的權力；相形之下，初嘗過問經濟大權的彭真，對劉少奇會作如何想呢？

1962 年上半年，劉少奇和彭真對經濟總體情勢的不同看法，自然會進一步地延伸、影響他們各自對具體經濟政策倡議的態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農村「包產到戶」的問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對於經濟情勢看法比較悲觀，咸認為必須正視和回應農村中愈漸擴大的「包產到戶」趨勢和呼聲。在陳雲、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各自的介紹和影響下，6 月底、7 月初，劉少奇不但同意「包產到戶」、更進而同意重新分田，冀以激勵農民生產、安度經濟難關。⁹⁰

⁸⁹ 鄧力群，〈關於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第3期(北京，2012.03)，頁12-14。

⁹⁰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1915-1974)》，頁436。

毛澤東自豪其領導下的中共，無論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上，皆別樹一幟地走出自己的道路；想不到作為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道路的核心制度設計——人民公社，建立未滿四年，就面臨了倒退和崩解的可能，而自己的主要副手不但沒有挺身制止，反而點頭應許。毛因此勃然大怒，當面嚴斥劉少奇：「為什麼不頂住？」「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⁹¹在毛澤東動怒表態後，劉少奇、鄧小平等旋即改變態度、自我檢討，陳雲更離開了決策核心。

相對於劉少奇和其以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數，沒能堅拒「單幹風」，在黨內地位緊接在中央常委之後的彭真，倒是一直旗幟鮮明地反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有資料指出：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批評「單幹風」時，就明確點名彭真是屬於「黨內堅決克服困難、不動搖」的人士之一。⁹²劉少奇的長子劉源後來也曾以彭真在 1960 年代初不支持「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為例，強調彭真對毛澤東「一直很尊重」、「盡力緊跟」，並指出彭真「和毛主席的觀點比較一致」。⁹³由此也可襯托出當時毛澤東和彭真之間的政治合拍程度，乃甚過於劉少奇和彭真之間。

需要強調的是，1962 年劉少奇、彭真之間在政策上的差異，主要是出於對實際問題和因應對策的不同認識，以及基於工作需要的研商討論、意見交換，而非是一種政治上的對立。所以劉少奇在該年上半年主導經濟調整時，並未對頻頻發出不同聲音的彭真惱怒；毛澤東在夏天大批「黑暗風」和「單幹風」後，彭真也沒有向劉少奇表現出什麼不友善的舉動（彭真趁此之機倒是可能曾意圖為難陳雲）。⁹⁴彭真對劉少奇尊重依舊，當然更與毛澤東此時有節制的政治態度和做法有關：毛僅在與劉少奇獨處之時對之大表不滿，而未將兩人意見分歧公諸高層；他在統一政治局常委意見後，就適可而止，而只將點名批判限於鄧子恢、田家英等，以免造成高層動盪，干擾、打斷經濟調整工作。

⁹¹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288。

⁹²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6）上冊，頁282-283。

⁹³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391。

⁹⁴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123。

十、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其引發的高層風波 (1963-1965)

中共的經濟調整工作持續進行、國民經濟逐漸轉危為安後，1963年起，毛澤東的思考重點轉向如何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社教運動)，一方面，避免前一陣子經濟困難期間出現種種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現象；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社會主義江山未來出現「變質」和「變色」的可能。另外，隨著毛澤東年事漸高，其後繼接班人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社教運動的發展和走向問題，最後竟演變成毛和劉少奇之間關係出現重大裂痕的事由。

1958年底，劉少奇開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1959年，劉也正式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1961年，毛在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時，公開宣稱劉少奇為他的接班人。1962年，劉少奇主持恢復國民經濟的工作，頗有成效(雖然在「黑暗風」、「單幹風」問題上，毛對之有些不滿意，但畢竟沒有在黨內公開)。1964年炎夏，毛澤東推舉劉少奇領導社教運動、號令全黨，並要鄧小平、彭真協助之。⁹⁵這些政治情況和動向，彭真都甚為清楚，也因而會視劉少奇為毛澤東的政治繼承人。

1964年7月25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工作會議上就曾表示：「接班人問題」「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問題，是百年大計的問題」；列寧、史達林對此都沒有解決。「毛主席在延安時，他不在就指定少奇代理。蒙哥馬利問他，誰是他的代理人，他說，少奇同志。這次主席提出，從中央到支部，到車間工段，到連隊，都要解決繼承人問題」。⁹⁶

彭真在此前不久更小範圍的黨內高幹互動中，也主動提到劉少奇過去在黨內的光榮事蹟。1964年6月18日，彭真對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西北局第一書記的劉瀾濤、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特別論及劉少奇在1937

⁹⁵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頁402。

⁹⁶ 彭真，〈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5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4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頁690。

年蘇區黨代表會議期間，因為堅持「白區」的「正確路線」而遭到高文華為首的「宗派活動」反對的過往。劉瀾濤聞後有感「增加了新的黨史知識」。⁹⁷

如前所述，在這起 1937 年的歷史事件中，彭真是當時與會人士中少數表態支持劉少奇的人(縱有部分的不同意見)。彭真此時在高層憶往的過程中，是否或隱或顯地同時傳遞一個政治訊息——劉少奇當年在黨內作為「正確路線」代表遭到孤立和圍攻時，是他與之並肩作戰，現在回想起來感到與有榮焉？然而，彭真對劉少奇尊崇的政治態度，隨後者在 1964 年後半年領導社會主義運動的地位、威勢起伏，而出現微妙的變化。

劉少奇在 1964 年夏「掛帥」主持社教運動以後，一反其自我要求、自謙避嫌的態度，大力推銷妻子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少奇的社教運動指導方針和「桃園經驗」對農村基層情勢的基本設想和具體做法，多是批評和改正先前的社教文件《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對「後十條」制定投入甚多心力的彭真，無論內心作何感想，按照中共下級服從上級的民主集中制和組織原則，他也公開附和劉少奇的運動新主張，並表示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得來不易，乃是經其「從頭蹲到尾」而來的。⁹⁸

由王光美總結、劉少奇認證(毛澤東也一度表示認可)的「桃園經驗」，對基層幹部普遍抱持狐疑、不信任的態度，以及對之開展批鬥、加以撤職的做法，經大力推廣後，使得彭真轄下北京市郊的基層幹部陷入四面烽火的處境。但是要直到毛澤東明確表達不滿劉少奇以後，彭真才開始表露對劉少奇的社教政策、乃至對其政治言行有所看法。

自毛澤東看來，劉少奇在 1964 年後半年大張旗鼓地推行「桃園經驗」，有將社教運動引入歧途、讓農村基層幹部大遭打擊之虞；劉在指揮運動中表現出來的強烈自信和強勢領導，更是讓毛感到不是滋味和心生威脅。1964 年底、1965 年初，毛澤東在黨內高層開會討論社教問題時，眾目睽睽之下嚴厲斥責劉少奇。眼見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意見公然不一致、特別是毛澤

⁹⁷ 思濤，《劉瀾濤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頁178-179。

⁹⁸ 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日)，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頁442。

東對劉少奇怒氣沖天，中共高幹圈大為震動、憂心不已。前去規勸劉少奇顧全大局、言行謹慎、要尊重毛澤東的高級領導人，除了周恩來、朱德、賀龍等人，⁹⁹彭真也在其列。

根據陳伯達、王力的回憶：陳、王兩人討論後，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大發雷霆、甚有意見之時，仍然信任彭真和陶鑄；最後便由陳伯達出面約找彭真、陶鑄一道與劉少奇相談，請之向毛澤東檢討以緩和兩人之間的關係。¹⁰⁰

在諸多黨國要人(包括彭真)的勸說壓力下，1965年1月13日下午，劉少奇在其住處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生活會，劉進行自我批評的同時，也接受他人對之的批評。劉少奇本人以外，有16人與會，其中包括彭真。彭真在此一針對劉少奇的生活會上有何表現，目前只有些許可能有關的旁證。

1965年1月6日，也就是批劉生活會舉行的前一週，彭真曾以電話專門同劉瀾濤回顧1950年代初期華北局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抱以暫緩態度的「錯誤」，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革命缺乏思想準備。¹⁰¹劉少奇當時也涉入此事，其支持華北局的立場，還遭到毛澤東的批評。彭真這時回顧、談論此一歷史，恐不僅是發「懷古之幽情」而已，而或與準備向劉少奇提批評意見有關。若再連想到僅在半年之前(1964年6月18日)，彭真才以當事人的身分，跟劉瀾濤、安子文話說、細數劉少奇1937年「舌戰群儒」之勇，真是此一時、彼一時。

根據當時在「中南海」工作的戚本禹的說法：在毛澤東、劉少奇因社教問題言語交鋒以後，「彭真批評劉少奇批得很厲害」。彭真批評劉少奇的內容包括：一、劉少奇跟毛澤東搶話、以至頂撞，乃是「對毛主席不尊重」；二、批評劉少奇「在農村問題上老想單幹」；三、當毛、劉談到「四清」的矛盾性質和運動重點時，毛指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表示不解其意，毛進而點名煤炭部部長張霖之。彭真認為劉少奇如此追問，反倒

⁹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冊，頁973。

¹⁰⁰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253。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下卷，頁574-575。

¹⁰¹ 思濤，《劉瀾濤生平紀事》，頁200。

是害了張霖之。¹⁰²

戚本禹並沒有說明前述彭真批劉言論是從何聽來。這是否為彭真在劉少奇的生活會上的發言，還有待將來其他相關史料面世佐證才能確認。如果戚本禹所言屬實，究其內容可略分為針對劉少奇在 1962 年農業「單幹風」的錯誤，以及其在 1964 年指導社教運動引發的爭議。這實無異於毛澤東在 1966 年 8 月 5 日發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批評劉少奇的兩個嚴重「錯誤傾向」——「1962 年的右傾」和「1964 年的形『左』而實右」。

十一、「文革」爆發前夕與其後

1964 年末、1965 年初，劉少奇遭到毛澤東當眾責罵、威望大失之後，彭真在中共中央的權位未受影響，反而一度有一支獨秀、直線上漲的態勢。例如：彭真接替劉少奇，領導改名為「四清」的社教運動；彭真也負責領導文化革命；尤有甚者，沒有軍事資歷的彭真，竟也開始得以過問軍隊工作。¹⁰³這再再反映了毛澤東對彭真的更是信任和器重。

由於彭真被毛澤東屢屢委以重任、授以大權，並經常獲之召見和單獨談話，使得他在「文革」前夕可能成為中央「一線」之中最有機會與毛澤東說得上話、又敢於對之說話的領導人。相對地，經過社教爭論後，毛澤東已不太搭理劉少奇。劉少奇因長期辛勤工作、積勞成疾，再加上遭毛澤東辱罵，心緒和生理難免受到連動影響，身體頻出狀況、進而病倒臥床。劉甚至曾祈求馬克思再給之十年時間為國家富強奮鬥。¹⁰⁴

在「文革」前夜，彭真對劉少奇的態度也出現微妙的變化：彭真公開表示崇敬的對象，從劉少奇變為林彪。1965 年 12 月 14 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工作會議上稱讚林彪「把(毛)主席思想高度地概括了」，兼是「卓越的軍事家」和「有很高馬列主義修養的政治家」。¹⁰⁵想想在不及一年半以前的市

¹⁰²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頁383。

¹⁰³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370。

¹⁰⁴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頁201。

¹⁰⁵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

委工作會議上(1964年7月25日)，彭真提到「要解決繼承人問題」時，還舉「少奇同志」是毛澤東的「代理人」為正面案例。經過社教問題引發的毛澤東對劉少奇震怒事件後，彭真在北京市委開會改口頌揚林彪，直截反映彭真對毛澤東政治選擇改向的敏銳和迎合。

1965年到1966年初，彭真在中共政壇上極其活躍和身肩重任。事實上，毛澤東同時也在對之考察和檢驗。彭真在「文革」前夕銜命處理多項重大事務時，身陷各種政治矛盾之中；在相關事態層層交疊、累積之下，毛澤東對彭真的信任短時之內快速流失，進而決心將之打倒。

在「四清」運動上，彭真調整先前劉少奇激進的運動政策，他為了維持穩定，對北京郊區和首都高校的運動加以限縮，既遭人非議「搞獨立王國」，也未必符合毛澤東的運動設想。在文化改革上，彭真與江青從京劇改革到文藝批判多有磨擦、嫌隙，江青向其夫告「枕頭狀」，負面影響毛澤東對彭真的觀感；毛澤東也從江青幕後安排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事，觀察彭真的意向。彭真先是反應消極，後來雖然同意予以轉載，但其經由制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試圖框限蔓延的批判之勢，更有失急躁地欲反手整飭激進文人。此事經康生挑撥和進讒，毛澤東對彭真益加惱火。在更深層的人事關係和政治鬥爭上，毛澤東欲倚重林彪打破現有權力格局，但林彪和彭真多年積怨難解，林彪又不願與之轉圜，也使毛澤東難以續用彭真；再加上，在批判羅瑞卿的問題上，彭真態度較為和緩，讓林彪和其他積極參與倒羅的軍方人士甚是不滿並向毛澤東呈報，亦另外增添了不利於彭真的政治變數。¹⁰⁶

原任中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的張文健，與彭真本人熟悉、常有交談。他就表示：「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整彭真是為了整劉少奇，這有點邪乎。毛主席和劉少奇的矛盾在前，和彭真的矛盾在後。毛主席和彭真

(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頁126。

¹⁰⁶ 鍾延麟，〈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2期(臺北，2014.11)，頁279-280。Yen-lin Chung,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43.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酉如訪談錄〉，《黨史文匯》，第11期(太原，2012.11)，頁21-22。

的矛盾主要是受了林彪、康生的蠱惑。」¹⁰⁷

當毛澤東明白表露離棄彭真的態度，劉少奇沒有為彭真伸以援手、仗義執言，反而對於欲登門求助的彭真避之唯恐不及。1966年4月底，毛澤東在杭州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決定批判彭真時，劉少奇甫結束國事訪問、返抵國門。劉少奇對中央政局在短時之內出現的急遽變化——彭真的政治暴落，無所知悉。但劉少奇在聽聞周恩來、謝富治代表中央介紹毛澤東批判彭真的決定後，立即知道所當何為。

劉少奇和周、謝談話的同時，彭真電話求見劉少奇，表示「要向少奇同志匯報」。彭真此時急找劉少奇，無非想要對後者解釋和說明，望之為己說項和澄清。但劉少奇沒有回電彭真，亦即沒有答應彭真欲單獨同之面談的請求。¹⁰⁸劉少奇最主要的考慮，應是毛澤東對於彭真的問題心意已決，何必自捋虎鬚、自找麻煩。一年以前，毛澤東因為社教問題嚴批劉少奇，彭真對之也加以指正和批評，劉少奇恐也記憶猶新，未見得全然釋懷。

彭真垮臺已成定局之後，劉少奇在1966年5月中旬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負責完成此一政治清洗的後續程序，並正式通過毛澤東預先審閱、痛批彭真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稱為「五一六通知」，常被視作「文革」正式開始的標誌)。

根據1930年代中期在華北與劉少奇有政治過節的高文華的揭發，1966年6月初，劉少奇曾主動找高文華問道：「林楓是你交給我的，現在聽說他是自首分子，你知道嗎？彭真也是你交給我的，他過去的歷史到底怎樣？」¹⁰⁹高氏所言若非不實，或顯示劉少奇擔心：彭真在與自己共事之前有歷史變節的問題。彭真在1935年出獄後，乃先與高文華「接上了關係」，劉少奇之後再任用之。為了釐清政治責任、甚至預作政治切割，劉少奇要高文華對此予以說明。

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會見北越領導人胡志明

¹⁰⁷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頁371。

¹⁰⁸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頁391。

¹⁰⁹ 高文華，〈痛斥劉少奇嫁禍柯慶施同志的無恥爛言〉，紅代會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一戰鬥團《新八一》編輯部，《新八一》，第18期(北京，1967.8.25)，3版。

時，咸認為「五一六通知」所提的「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¹¹⁰亦即劉少奇認為其指的就是彭真。彭真在看了「五一六通知」後則私下表示：「赫魯曉夫式人物不是指我，我不夠格。」¹¹¹以彭真長期身處中共核心高層的經歷，以及同毛澤東近身相處的經驗（劉少奇政治失寵後，彭真仍在一段時間內保有毛的寵信），他知曉毛澤東對劉少奇、以至更大的既有體制的深切不滿。因此，彭真認為毛澤東所指的「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地位還在彭真本人之上、而且在他垮臺時仍在其位。彭真的政治預感，到後來劉少奇被冠以「中國的赫魯曉夫」的政治大帽後，得到了證實。

彭真聞知劉少奇政治地位也不保以後，也開始表露過去在政策上曾與劉少奇抱持不同的觀點。1967年7月20日，彭真在遭受批鬥時表示：「我不是一貫反毛主席的」，「四清時我也不同意劉少奇的，沒有破壞四清」。¹¹²但是彭真在遇到有人欲對劉少奇羅織通敵罪名之時，則堅持原則地為之澄清和證明。¹¹³

毛澤東先後打倒彭真、劉少奇，讓他們消失在中共的政治舞臺上。然而，經過仔細的對比，可以發現毛澤東對此二人並非簡單地一併徹底革除。針對劉少奇，毛澤東批可將之定性為「叛徒、內奸、工賊」的政治結論，同意開除其黨籍。本已得不到充分醫療照顧的劉少奇，1969年在悲憤交加下離世。彭真苦蹲牢房，嘗盡不人道的待遇，但畢竟倖免一死。林彪葬身大漠後，毛澤東一度念及彭真並詢問其情況。然而，周恩來似不樂見彭真的東山再起，毛澤東對此也沒有堅持。但是毛卻始終沒有批可將彭真定為叛徒的專案調查結論。¹¹⁴彭真離開大牢後被流放安置在陝西商洛，但終究得以保留其黨籍。這也是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並未將劉少奇、彭真等同

¹¹⁰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1841。

¹¹¹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3卷，頁1234。

¹¹² 〈看！落水狗還沒死〉，北京工業大學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第20號（北京，1967.8.23），4版。

¹¹³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3卷，頁1261。

¹¹⁴ 鍾延麟，〈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頁288-289。

看待和處置。如果真如西方有關論者所以為的劉少奇和彭真在黨內結黨對付毛澤東，皆睚必較、有仇必報的毛澤東，豈會在虐待劉少奇致死後，不去徹底政治追殺彭真、免得留下後患？

十二、結論

針對劉少奇、彭真之間政治關係的問題，長期流行的觀點和敘述為：劉少奇、彭真之間乃屬庇護與扈從的派系關係，兩人猶如「鐵板一塊」的政治共同體，或明或暗地一致抗拒毛澤東及其激進政策，最終也同遭滅頂之災。此一論點簡白易懂，廣為流傳，但卻可能受到「文革」官方批鬥論調和揭發資料的影響與誤導。從正文對彭真和劉少奇之間歷年的政治、工作關係所作的細節回溯和事實重建，可以發現這種普遍流行的看法和認識，實失之簡陋，不但不明劉少奇、彭真雙邊關係發展歷程的複雜和糾葛，也不察在兩方互動過程中極其關鍵的毛澤東角色和因素，以及背後的各自利害盤算和私我動機，同時也對劉、彭選擇信從毛澤東以後的主要政治傾向和行徑，以至更大的歷史發展過程(特別是「文革」醞釀過程和成因的解釋)，有不少的誤解與扭曲。

最後，簡要觀察彭真在「改革開放」時期如何看待其自身在「文革」前和劉少奇之間的政治關係和往來。1978年底，彭真返抵北京，再次回到中共的政治舞臺。彭真在1980年表示：

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主席與少奇或者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¹¹⁵

彭真相關言論除了想要表明政治心跡(忠心於毛)和以正視聽(絕無與劉結黨)，或許其中還有藉以說明他自己當年享有獨立的政治地位的用意，甚至到「文

¹¹⁵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復出後談毛澤東〉，《百年潮》，第12期(北京，2012.12)，頁75。

革」前夕還有「更上一層樓」、步入接班行列的可能。彭真在晚年曾指出：「發動『文革』，有個接班人的鬥爭問題，把彭羅陸楊搞下來，不一定是毛主席的本意。」亦即彭真認為其自身之所以在「文革」初倒臺，主要肇因於林彪為了搶佔接班位置，施計排除以彭真為主的競爭對手。彭真另外也說：「毛主席要重用林彪，就不會容忍我在身邊。」¹¹⁶如此反映就其自身的認識和理解，林彪是造成他被毛澤東棄置、打倒的最關鍵原因，而非是劉少奇。

彭真對劉少奇的政治生涯和起落可謂知根知底。他晚年卻曾反過來問劉源：「毛主席為甚麼要搞『文化大革命』？為甚麼要打倒你父親？」¹¹⁷彭真顯然是明知故問，但他又為何有此一問呢？令人感到好奇，也留下一個歷史的疑竇。

¹¹⁶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頁158。

¹¹⁷ 劉源、何家棟，〈可貴的嘗試〉，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頁46。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檔案史料

- 〈少奇同志七月四日在石景山鋼鐵廠的情況〉(1958年7月4日)，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1，目錄號015，案卷號00164。
- “Shaoqi tong zhi qi yue si ri zai Shijingshan gang tie chang de qing kuang” (1958 nian 7 yue 4 ri), Beijing shi dang an guan, cang, quan zong hao 001, mu lu hao 015, an juan hao 00164.
- 〈少奇同志在石景山發電廠的談話〉(1958年7月5日)，北京市檔案館藏，全宗號001，目錄號015，案卷號00164。
- “Shaoqi tong zhi zai Shijingshan fa dian chang de tan hua” (1958 nian 7 yue 5 ri), Beijing shi dang an guan, cang, quan zong hao 001, mu lu hao 015, an juan hao 00164.
- 〈看！落水狗還沒死〉，北京工業大學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工業大學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第20號(北京，1967.8.23)，4版。
- “Kan! luo shui gou hai mei si,” Beijing gong ye da xue ge ming wei yuan hui, Hong dai hui Beijing gong ye da xue dong fang hong gong she, *Dong fang hong*, di 20 hao (Beijing, 1967.8.23), 4 ban.
- 〈張兆豐致中央的信——對順直工作的意見〉(1928年10月5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出版地不詳：河北省政府印刷廠，1991)，甲種本，第2冊，頁508-516。
- “Zhang zhao feng zhi zhong yang de xin: dui Shunzhi gong zuo de yi jian” (1928 nian 10 yue 5 ri), shou ru,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Hebei sheng dang an guan, bian. *Hebei ge ming li shi wen jian hui ji*, (chu ban di bu xiang: Hebei sheng zheng fu yin shua chang, 1991), jia zhong ben, di 2 ce, 508-516.
- 〈與李芳啟談話——樂亭縣黨的各項工作情況〉(1928年12月20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出版地不詳：河北省政府印刷廠，1991)，甲種本，第2冊，頁578-584。
- “Yu Li fang qi tan hua: Leting xian dang de ge xiang gong zuo qing kuang” (1928 nian 12 yue 20 ri), shou ru,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Hebei sheng dang an guan, bian. *Hebei ge ming li shi wen jian hui ji*, (chu ban di bu xiang: Hebei sheng zheng fu yin shua chang, 1991), jia zhong ben, di 2 ce, 578-584.

〈劉少奇關於應以主要力量建立東、西、北滿根據地致彭真電〉(1945年12月24日)，收入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第15冊，頁512-514。

“Liu shaoqi guan yu ying yi zhu yao li liang jian li dong, xi, bei man gen ju di zhi Peng zhen dian” (1945 nian 12 yue 24 ri), shou ru,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bian.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jian xuan ji*, (Beijing: Zhong gong zhong yang dang xiao chu ban she, 1991) di 15 ce, 512-514.

〈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1966年6月27日)，收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電子資源。

“Liu shaoqi zai zhong gong zhong yang zhao ji de min zhu ren shi zuo tan hui shang de jiang hua” (1966 nian 6 yue 27 ri), shou ru, Song yong yi, deng bian. *Zhongguo wen hua da ge ming wen ku*,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Zhongguo yan jiu fu wu zhong xin, 2002, dian zi zi yuan.

〈樂亭縣委關於改造順直黨的意見〉(1928年12月18日)，收入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出版地不詳：河北省政府印刷廠，1998)，甲種本，第17冊，頁32-38。

“Leting xian wei guan yu gai zao Shunzhi dang de yi jian, (1928 nian 12 yue 18 ri), shou ru,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Hebei sheng dang an guan, bian. *Hebei ge ming li shi wen jian hui ji*, (chu ban di bu xiang: Hebei sheng zheng fu yin shua chang, 1998), jia zhong ben, di 17 ce, 32-38.

〈關於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問題〉(1952年7月15日、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第4冊，頁333-337。

“Guan yu jia qiang dang zhong yang ban shi ji gou wen ti” (1952 nian 7 yue 15 ri, 18 ri), shou ru,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Zhong yang dang an guan, bian. *Jian guo yi lai Liu shaoqi wen ga*,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5) di 4ce, 333-337.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1967。

Yuan Beijing shi wei ji guan Mao ze dong si xiang hong qi bing tuan, *Da ye xin jia, da yin mou jia Peng zhen zui e shi (1925-1966)*, Beijing, 1967.

高文華，〈痛斥劉少奇嫁禍柯慶施同志的無恥爛言〉，紅代會北京建築工業學院新八一戰鬥團《新八一》編輯部，《新八一》，第18期(北京，1967.8.25)，3版。

Gao, wen hua, “Tong chi Liu shaoqi jia huo Ke qing shi tong zhi de wu chi lan yan,”

Hong dai hui Beijing jian zhu gong ye xue yuan xin ba yi zhan dou tuan Xin ba yi bian ji bu, *Xin ba yi*, di 18 qi (Beijing, 1967.8.25), 3 ban.

彭真，〈在市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4年7月25日），收入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64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6），頁677-693。

Peng, Zhen. "Zai shi wei gong zuo hui yi shang de jiang hua," (1964 nian 7 yue 25 ri), shou ru, Beijing shi dang an guan, Zhong gong Beijing shi wei dang shi yan jiu shi, bian. *Beijing shi zhong yao wen xian xuan bian (1964 nian)*, (Beijing: Zhong guo dang an chu ban she, 2006), 677-693.

劉少奇，〈關於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問題〉（1948年9月13日），《黨的文獻》，第5期（北京，1989.09），頁7-11、22。

Liu, Shaoqi. "Guan yu xin min zhu zhu yi de jian she wen ti," (1948 nian 9 yue 13 ri), *Dang de wen xian*, di 5qi (Beijing, 1989.09), 7-11, 22.

劉少奇，〈關於社會主義教育問題和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問題的報告〉（1964年8月1日），收入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人民出版社資料室，1967），頁403-442。

Liu, Shaoqi. "Guan yu she hui zhu yi jiao yu wen ti he liang zhong lao dong zhi du, liang zhong jiao yu zhi du wen ti de bao gao," (1964 nian 8 yue 1 ri), shou ru, Ren min chu ban she zi liao shi, bian. *Pi pan zi liao: Zhongguo he lu xiao fu Liu shaoqi fan ge ming xiu zheng zhu yi yan lun j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zi liao shi, 1967), 403-442。

(二) 回憶史料

王力，《王力反思錄》，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Wang, Li. *Wang li fan si lu*, xia juan, Xianggang: Bei xing chu ban she, 2001.

王漢斌口述、韓勤英訪問，〈在彭真身邊工作二十五年的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第10期（北京，2012.10），頁68-73。

Wang, Hanbin, kou shu, Han, Qinying, fang wen. "Zai Peng zhen shen bian gong zuo er shi wu nian de pian duan hui yi," *Zhong gong dang shi yan jiu*, di 10 qi (Beijing, 2012.10), 68-73.

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Li, Haiwen, Wang, Yanling, bian zhe, *Shi ji dui hua: yi xin zhong guo fa zhi dian ji ren Peng zhen*, Beijing: Qun zhong chu ban she, 2002.

-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 Li, Xin. *Liu shi de sui yue: Li xin hui yi lu*,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8.
- 李葆華，〈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中國人民銀行編，《李葆華紀念文集》，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11。
- Li, Baohua. “Wo di yi ci jian dao Mao zhu xi,” *Zhongguo ren min yin hang, bian. Li bao hua ji nian wen ji*, Beijing: Zhong guo jin rong chu ban she, 2011.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3版。
- Li, Rui. *Lushan hui yi shi lu*, Zhengzhou: Henan ren min chu ban she, 2000, di 3 ban.
- 金沖及，《一本書的歷史：胡喬木、胡繩談《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
- Jin, Chongji, *Yi ben shu de li shi: Hu qiaomu, Hu sheng tan Zhongguo gong chan dang de qi shi ni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4.
- 柯六六，〈延安審幹運動中的柯慶施——來自親歷者的回憶〉，《江淮文史》，第2期(合肥，2012.03)，頁78-84。
- Ke, Liuliu. “Yanan shen gan yun dong zhong de Ke qingshi: lai zi qin li zhe de hui yi,” *Jiang huai wen shi*, di 2qi (Hefei, 2012.03), 78-84.
-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Hu, Qiaomu. *Hu qiaomu hui yi Mao Zedong*,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4.
- 馬句，〈憶彭真——寫在紀念彭真誕辰100周年之際〉，《前線》，第10期(北京，2012.10)，頁57-59。
- Ma, Ju. “Yi Peng zhen: xie zai ji nian Peng zhen dan chen 100 zhou nian zhi ji,” *Qian xian*, di 10 qi (Beijing, 2012.10), 57-59.
- 張明遠，《我的回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 Zhang, Mingyuan. *Wo de hui yi*,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2004.
-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上冊，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社，2016。
- Qi, Benyu. *Qi benyu hui yi lu*, shang ce, Xianggang: Zhongguo wen ge li shi chu ban she, 2016.
- 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 Mo, Wenhua. *Mo wenhua hui yi lu*, Beijing: Jie fang jun chu ban she, 1996.
-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 Chen, Xiaonong, bian zuan. *Chen boda zui hou kou shu hui yi*, Xianggang: Yang guang huan qiu chu ban xiang gang you xian gong si, 2005.
- 曾志，《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憶實錄》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8。

Ceng, zhi. *Yi ge ge ming de xing cun zhe: Ceng zhi hui yi shi lu, xia ce*, Guangzhou: Guangdo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8.

程光，《歷史的回顧——邱會作與兒子談革命經歷和若干歷史問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Cheng, Guang. *Li shi de hui gu: Qiu hui zuo yu er zi tan ge ming jing li he ruo gan li shi wen ti*, Xianggang: Bei xing chu ban she, 2011.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Huang, Zheng, zhi bi. *Wang guang mei fang tan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6.

鄧力群，〈我為少奇說些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Deng, Liqun. “Wo wei shaoqi shuo xie hua,”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di er bian yan bu, bian. Hua shuo Liu shaoqi: zhi qing zhe fang tan lu*,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0.

鄧力群，〈關於西樓會議的回憶〉，《百年潮》，第3期(北京，2012.03)，頁11-17。

Deng, Liqun. “Guan yu Xilou hui yi de hui yi,” *Bai nian chao*, di 3 qi (Beijing, 2012.03), 11-17.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Deng, Liqun. *Deng liqun zi shu (1915-1974)*,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1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修訂本。

Bao, Yibo. *Ruo gan zhong da jue ce yu shi jian de hui gu, xia juan*,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1997, xiu ding ben.

(三)年譜、日記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nian pu (1893-1949)*, xia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Liu shaoqi nian pu*, shang, xia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Chen yun nian pu*, shang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0.
- 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彭真生平大事年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 Zhong gong Shanxi sheng wei dang shi yan jiu shi, *Peng zhen sheng ping da shi nian biao*, Beijing: Zhong gong dang shi chu ban she, 1992.
-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1、3、5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bian. *Peng zhen nian pu*, di 1, 3, 5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四) 研究專書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Liu shaoqi chuan*, shang,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Zhou enlai chuan*, xia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Chen yun chuan*, shang ce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5.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第2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 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 bian. *Mao zedong chuan*, di 2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07.
- 李昌遠編著，《彭真與土改》，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Li, Changyuan, bian zhe. *Peng zhen yu tu gai*,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2.
-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 Shen, Zhihua. *Si kao yu xuan ze: cong zhi shi fen zi hui yi dao fan you pai yun dong (1956-1957)*,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08.
- 思濤，《劉瀾濤生平紀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
- Si, tao. *Liu lantao sheng ping ji shi*, Beijing: Zhongguo wen shi chu ban she, 2010.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
- Gao, Wenqian. *Wan nian Zhou enlai*, New York: Ming jing chu ban she, 2003.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Gao, Hua. *Hong tai yang shi zen yang sheng qi de: Yanan zheng feng yun dong de lai long qu mai*,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00.
-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 Zhang, Suhua. *Bian ju: qi qian ren da hui shi mo*, Beijing: Zhongguo qing nian chu ban she, 2006.
- 陳野蘋、韓勁草主編，《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Chen, Yeping, Han, Jincan, zhu bian. *An zhiwen chuan lue*, Taiyuan: Sh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1985.
-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Chen, Yaohuang. *Tong he yu fen hua: Hebei di qu de gong chan ge ming, 1921-1949*, Taipei: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2012.
-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Tian, Youru. *Peng zhen chuan lu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傳》，第1、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bian, *Peng zhen chuan*, di 1, 3 juan, Beijing: Zhong yang wen xian chu ban she, 2012.
- 景玉川，《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
- Jing, Yuchuan. *Rao shushi*, Xianggang: Shi dai guo ji chu ban you xian gong si, 2010.
-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 Zhao, Jialiang, Zhang, Xiaoji. *Ban jie mu bei xia de wang shi: Gao gang zai Beijing*, Xianggang: Da feng chu ban she, 2008.
-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
- Liu, Yuan. *Liu shaoqi yu xin Zhongguo*, Xianggang: Da feng chu ban she, 2005.
-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 Qian, Xiangli. *Li shi de bian ju: cong wan jiu wei ji dao fan xiu fang xiu (1962-1965)*, Xianggang: Xianggang zhong wen da xue chu ban she, 2008.
- 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
- Dai, Maolin, Zhao, Xiaoguang. *Gao gang chuan*, Xian: Shaanxi ren min chu ban she, 2011.
-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Cong, Jin. *Qu she fa zhan de sui yue*, Beijing: Ren min chu ban she, 2009.
- Dittmer, Lowell. *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rmonk: M. E. Sharpe, Inc., 1998, revised edition.
-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otter, Pitman B.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second edition.

(五) 論文

- 金冲及，〈劉少奇與白區工作會議〉，《黨的文獻》，第2期(北京，1999.03)，頁29-39。
- Jin, Chongji. “Liu shaoqi yu bai qu gong zuo hui yi,” *Dang de wen xian*, di 2 qi (Beijing, 1999.03), 29-39.
- 孟紅、任遠、王燕萍，〈彭真：一生實事求是與堅持真理——黨史專家田西如訪談錄〉，《黨史文匯》，第11期(太原，2012.11)，頁15-22。
- Meng, Hong, Ren Yuan, Wang, Yanping. “Peng zhen: yi sheng shi shi qiu shi yu jian chi zhen li: dang shi zhuan jia Tian youru fang tan lu,” *Dang shi wen hui*, di 11 qi (Taiyuan, 2012.11), 15-22.
-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復出後談毛澤東〉，《百年潮》，第12期(北京，2012.12)，頁75-76。
- Peng zhen chuan bian xie zu, “Peng zhen fu chu hou tan Mao zedong,” *Bai nian chao*, di 12 qi (Beijing, 2012.12), 75-76.
- 劉政、張春生，〈從歷史的幾個重大關節看彭真和毛澤東的關係〉，《領導者》，總第51期(香港，2013.04)，頁136-159。
- Liu, zheng, Zhang, Chunsheng. “Cong li shi de ji ge zhong da guan jie kan Peng

- zhen he Mao zedong de guan xi,” *Ling dao zhe*, zong di 51 qi(Xianggang, 2013.04), 136-159.
- 劉源、何家棟，〈可貴的嘗試〉，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歷史應由人民書寫——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 Liu, Yuan, He, Jiadong. “Ke gui de chang shi,” Wang, Guangmei, Liu, Yuan, deng zhe, Guo, Jiakuan, bian. *Li shi ying you ren min shu xie: ni suo bu zhi dao de Liu shaoqi*, Xianggang: Tian di tu shu you xian gong si, 1999.
- 鍾延麟，〈彭真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6卷第2期(臺北，2014.06)，頁247-292。
- Chung, Yen-lin. “Peng zhen zai 1957nian zheng feng, “fan you pai” yun dong zhong de jiao se yu zuo wei,” *Ren wen ji she hui ke xue ji kan*, di 26 juan di 2 qi (Taipei, 2014.06), 247-292.
- 鍾延麟，〈周恩來與彭真關係之研究(1928-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2期(臺北，2014.11)，頁261-302。
- Chung, Yen-lin. “Zhou enlai yu Peng zhen guan xi zhi yan jiu (1928-1976),” *Guo li zheng zhi da xue li shi xue bao*, di 42 qi (Taipei, 2014.11), 261-302.
- 鍾延麟，〈彭真和中共東北局爭論——兼論其與高崗、林彪、陳雲之關係(1945-199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期(臺北，2016.03)，頁99-151。
- Chung, Yen-lin. “Peng zhen he zhong gong Dongbei ju zheng lun: jian lun qi yu Gao gang, Lin biao, Chen yun zhi guan xi (1945-1997),”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jin dai shi yan jiu suo ji kan*, di 91 qi (Taipei, 2016.03), 99-151.
- Chung, Yen-lin. “The Unknown Standard-Bearer of the Three Red Banners: Peng Zhen’s Roles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hina Journal*, 74(2015), 129-143.
-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From a Leninist to a Charismatic Party: The CCP’s Changing Leadership, 1937-1945,” in Tony Saich and Hans J. van de Ven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New York: M.E. Sharpe, 1995, 339-387.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ng Zhen and Liu Shaoqi (1928-1966)

Chung, Yen-Li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nventional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hip, especially the factional-politics model adopted by many Western scholars, tends to portray Peng simply as a true subordinate of Liu who supported Liu without reservation. This study, based on careful examination of evidences,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ventional view of Peng-Liu rel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historical truth.

Peng and Liu met and worked together briefly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28. After Peng was released from jail in 1935, they developed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However, instead of cultivating a close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eir main concern and top priority were to carefully maintain their individual relations with Mao Zedong, as they both respectfully considered Mao as CCP's top leader. Moreover, Mao became the most crucial factor affecting Peng's and Liu's attitudes towards each other.

From the mid-1940s to the mid-1960s, Peng showed great respect and support for Liu,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that Liu was Mao's successor and most important assistant; Liu supported Peng because Peng had always been entrusted with crucial political posts. Some subtle changes

took place after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ao and Liu had divergent views on the issue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 1962 and on the Socialism Education Movement in 1964. In contrast to Liu, Peng shared similar views with Mao on these issues; he sided with Mao without hesitation, even launched criticism against Liu. However, Mao's relationship with Peng deteriorated quickly after 1965; Peng was purged before the downfall of Liu.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both Peng and Liu were victims of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treated the two political figures differently: while Liu was persecuted to death, Mao showed some mercy towards Peng and disapproved accusations of treason against him. This showed that to Mao, Peng was not simply deemed as Liu's trusted follower. In su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ring the pre-Cultural Revolution period, Peng and Liu were not the inseparable political allies as the analysis of factionalism has asserted.

Keywords: Peng Zhen, Liu Shaoqi, Chinese Elite Politics, Chinese Communist